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回忆周总理

同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吴庆彤 著

序

李琦

吴庆彤同志写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版了。作者原为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室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先后主持国务院值班室和以后组建的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当时，这两个部门是国务院机关中仅有的正常运转的部门。1979年机构恢复正常时，他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等职。

恰好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办公室被迫撤销，只留了两三个同志应付众多繁杂的事务。这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经常通过国务院值班室和国务院办公厅或委托吴庆彤同志个人去办一些事情。正由于有这样的经历和机遇，吴庆彤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情况自然要比一般人知道的多一些，感触要深一些。“文革”结束后，他为了弄清那个特殊年代中的一些问题，不断地阅读有关书籍，查找资料，包括档案。

为了纪念周总理一百周年诞辰，吴庆彤同志和原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一些老同志在去年共同议定写一本回忆文集。他积极准备，埋头写作，冒着多年不遇的酷暑，满怀激情，一口气写出了这本书。这对一位从来不写文章的老同志来说，已经算是不容易了。这本书并不厚，十万字左右，却包括了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方方面面，其中有的内容在已出版的书籍中是较少涉及的，还有不少事情是吴庆彤同志耳闻目睹，甚至亲手经办，其叙述就更加真实、生动。全书文字朴素，脉络清楚，读起来毫不费力，很适合于一般读者，特别是青少年阅读。

周恩来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他经历了无数政治风浪，处理过许多复杂事件，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文化大革命”阶段，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困难最艰险的日子。因为“文化大革命”是当时党内外具有最高权威的毛主席发动的，周恩来不可能公开反抗。他既要从小局出发维护毛主席的威信，又要采取坚韧、迂回的办法巧妙斗争。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处心积虑地要打倒周恩来，千方百计地对他进行刁难与折磨，明枪暗箭一齐来。许多青年人被野心家煽动，呈现狂热的无政府思潮，热衷搞打砸抢，甚至搞武斗。由此，整个社会秩序混乱，生产下降。面对这样的局势，周恩来的困难处境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他本人还随时有被打倒的危险。

但是，周恩来并没有逃避，没有畏惧，而是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挺身而出，为尽可能地减少“文化大革命”的损失奋力搏斗。综观“文化大革命”全过程，他在一些问题上同毛主席的主张和作法并不完全相同，而是有所区别，有时甚至差异很大。他对毛主席的号召、指示，既有遵照执行的一面，也有在适时地、恰当地作出全面解释并尽可能修正其中偏差的另外一面。同时，他还善于抓住有利时机提出正确的口号、措施和意见，千方百计地加以贯彻。对于两个反革命集团，周恩来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或与之周旋，巧妙斗争；或抓住时机，进行反击。如隔离审查王、关、戚，“九一三”前后粉碎林彪集团，长沙之行挫败江青集团组阁阴谋，在重病中及时告诫叶帅注意斗争方式、不要把大权落在“四人帮”手中，等等。当然，他也曾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但是人民谅解他。因为当时老一辈革命家几乎都被打倒了。小平同志说：“幸好保住了周恩来。”陈云同

志也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这些话都是一针见血，多么精辟啊！

周恩来的一生对国家、对人民作出过很多贡献。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忍辱负重，砥柱中流。大家都知道他保护了一大批党内的干部，并且极力促成邓小平复出。没有这些骨干中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局面也就无从说起了。其实，周恩来在尽可能维持国家机器运转，保障几亿人民的衣食住行，发展“两弹一星”，打开外交新格局，加强经济文化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令人难忘的巨大贡献。尤其在漫长的艰难的岁月里，他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人民的高贵的精神和品质，更使世人感动，并时时激发人们对他的敬仰、怀念。周恩来逝世后，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十里长街百万人送葬的动人场面，最终爆发了惊天地、泣鬼神、敲响“四人帮”灭亡的丧钟的伟大的四五运动。这些历史现象绝非偶然！周恩来虽然离开我们廿二年了，但广大的人民群众并没有忘记他，而是愈加怀念，愈加敬仰！他的精神仍然鼓舞着我们前进！

在周恩来诞辰百周年前夕，在吴庆彤同志著书出版之际，我仅写以上这些话，作为纪念。

1998年1月18日

前言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他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于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林彪、江青等人，为了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组成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主席的错误，把它推向极端，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克服重重困难，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汪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国务院秘书厅工作，担任秘书室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潮，迅速冲击到国务院机关。国务院秘书长、副秘书长，有的“靠边站”，有的被“专政”，有的被迫害致死，国务院直属机关基本瘫痪。1967年8月，周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同志决定，组建国务院值班室，我担任值班室主任，为总理、副总理月民务。1970年国务院直属口改组为国务院办公厅，开始，军代表为主，我为副；以后，我负责全面工作，仍然为总理、副总理服务，协助国家领导人处理国务院日常具体事务。对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活动，有所了解。在周总理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有义务将我接触到的、看到的和听到的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情况，根据历史事实，作一记述，以此来缅怀敬爱的周总理。

吴庆彤
一九九七年冬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一、“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总理就对这场“革命”很不理解

毛主席 1966 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当时党和国家的政治形势作出的错误估计，集中反映在 1966 年 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 8 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两个文件中。

毛主席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历史已经证明，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在这个基础上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错误的。

在“文化大革命”酝酿准备阶段，毛主席找的是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人，没有找周总理商议。当时，周总理正在集中精力调查研究冀、鲁、豫、晋、陕、辽、京、蒙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防涝工作，并把它作为农业上的主攻方向，长期抓下去，扭转“南粮北调”问题；同时处理河北省邢台大地震所造成的严重自然灾害问题。因此，周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缺乏思想准备，对毛主席发动这场“革命”的深层想法不大清楚。他本着对毛主席的一贯尊重和信任，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赞同了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准备的“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文件。尽管如此，周总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草稿）时，与陶铸同志商量删去了原稿中“黑帮”、“黑线”的提法，并增加了不少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必须严格区别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对干部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文斗不要武斗；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等等。这些修改得到毛主席同意。然而，由于周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与毛主席不一致，所以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必然会出现分歧。例如，1966 年 5 月 25 日，在康生、曹轶欧策划下，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所谓“第一张”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周总理知道后，连夜派华北局、国务院外办、高教部的负责人到北京大学，批评聂元梓等人搞乱了中央的部署，违反了中央“内外有别”的规定。并重申了中央规定，要他们严格遵守。康生得知周总理的批评后，立即要来大字报底稿，背着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密报给在外地的毛主席。6 月 1 日，毛主席指示康生、陈伯达：“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

8 月 23 日，周总理审定李富春与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余秋里、姚依林等同志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 16 条）精神拟定的国务院八个口（外交、文教、科学三个口除外）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十条意见稿。这十条意见的主要精神是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提出要保护国家机密；对一部分干部“烧”到一定程度后要注意保护；既要放手让群众

敢于革命，又要让群众学会善于革命，善于掌握党的政策；等等。周总理在一旁批注：这十条意见同样适用于外事、文教、科学三口。并批告陈伯达：“这件很好，我注了几条意见，如蒙同意，请送主席、林彪同志核阅，并请主席批示，可否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各同志。”毛主席不同意批发这十条意见。在8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有16条嘛！”

8月31日，周总理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稿”。这是陶铸同志根据周总理的意见组织人起草的，准备下发到县团级。鉴于红卫兵到处冲击，全国出现混乱局面，“通知稿”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部门对党和国家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必须坚决进行保护。“通知稿”列出的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有：军队、军事机关、公安机关、外事部门，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广播电台、电视台、新华社、电讯部门和各级党政机关的电台、机要部门，中央和各地档案部门，航空站，铁路枢纽、站段，港务局、码头，水电站、大电厂、变电站，尖端企业和尖端科研部门，科学研究机构和科技本资料部门，中央和各地的银行、仓库，外贸机关，城市重要公用事业机关（自来水公司、公共汽车公司等）。周总理审阅时又增加了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红旗杂志社，批：提议照发，请主席、林彪、康生、富春、江青核阅，退汪东兴办。9月1日，毛主席批：此件不发。

9月2日，周总理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对红卫兵运动提出十条要求。主要内容是：红卫兵要学习解放军，“把红卫兵建设成为一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严格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伍”。要“学习和掌握政策”，“分清敌我，团结大多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现阶段中，仍然是需要的、正确的”，“对于在国家和统一战线中具有合法地位的民主人士和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只要没有发现现行反革命活动，应当加以保护”。“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红卫兵搜捕人，必须与北京市委、卫戍区和公安部商定。红卫兵串连“要保障党和国家的首脑部门、要害部门和宣传工具”，“使这些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安全不遭危害”；“要保障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不受阻挠，要保障党和国家的对外关系和活动不受影响”，“革命串连不在这些机关内部进行”；“要保障厂矿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受影响，科研机关的科学实验和中间性生产不致中断”等等。3日凌晨，周总理对《意见》进行了最后修改，嘱秘书通知陶铸、康生、李富春、谢富治、陈毅、杨成武、吴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上午开会讨论。会上，陶铸、陈毅等同志赞成《意见》，康生等人则持否定态度，结果《意见》没有发出。

周总理的主张连续三次被毛主席否定。9月2日，周总理提出的《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又遭到康生等人的反对。周总理清楚，康生等人的反对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主席的主张，因此，《意见》未送毛主席。这表明，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许多事实说明，周总理在实际上下认为中央有个“刘、邓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因此，当红卫兵到处冲击，搞乱全国的时候，他心急如焚，主张立即加以制止，维持党政机关的工作秩序，维持经济生活秩序，维持社会主义法律秩序。毛主席的想法与周总理的想法大相径庭，他要在中

央摧毁所谓“刘、邓司令部”，在全国夺取所谓“刘、邓代理人”篡夺的权力。他的方针是要用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不顾一切地发动群众，不允许加以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曾考虑自己是不是“思想落后”、“跟不上形势”？并表示要跟上去。但是“左”倾路线的严酷现实，使周总理越来越难以理解。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利用毛主席的错误，把它推向极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很快把全国搞乱。周总理对此是绝不能容忍的，与他们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周总理与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作法上的分歧和矛盾逐渐加深。周总理深知，毛主席的“左”倾错误是难以纠正的。如果进行正面对抗，不仅无济于事，还会把党政大权让给林彪、江青一伙，也有可能造成党、军队、国家的分裂，从而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从大量事实可以看出，他权衡利弊，确定采取在总体上支持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实际工作上用毛泽东思想纠正“文化大革命”一切过火的、极端的作法，努力减少“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损失，等待时机纠正错误。历史已经证明，这是正确的选择。周总理做出这样的选择，不可避免的要说一些违心的话，办一些违心的事。这是表面现象，而不是本质。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二、建国后十七年起主导作用的是 革命路线，还是修正主义路线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估计，如前所述，是不符合实际的、错误的。但是毛主席并不想否定一切。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抱着篡党夺权的目的，利用毛主席的错误，推波助澜，否定一切，胡说建国后17年我国各方面的工作实行的都是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把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干部，都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他们的煽动下，大批学生冲向社会，冲向党政机关，冲向文化领域，冲向教育科研单位，许多党政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爱国民主人士被扣上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反动资本家等等帽子，受到抄家、揪斗、游街、殴打等人身迫害和侮辱。周总理对于这种践踏法制、违反政策的行为，坚决反对，极力阻止。他在北京多次接见红卫兵代表时，批评他们的错误行为，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对他们进行教育。他说：“不是所有的文教机关、党政机关的领导者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那样看，把党中央放到哪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落空了吗？”“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同志犯了错误，但不是一切党政领导机关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都是黑帮、黑线。黑帮、黑线这些词早就不用了，你们翻开十六条看看”。“说一切都是坏的是不对的，就是说多数是坏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多数还是好的。”针对林彪、江青一伙片面强调“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等谬论，周总理说：“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都要有领导”，“没有领导，谁去依靠，谁去放手，谁去走啊？”周总理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民主需要集中，自由需要纪律。反对极端民主，反对无政府主义。

1966年9月初，鉴于许多爱国人士受到冲击，统战政策遭到破坏，周总理指示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统战部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不管，统战政策必须坚持下去。

1966年10月15日，周总理和江青等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有关人员，有人提出“上海以总理说上海市委是正确的讲话为盾牌，压制革命”，周总理回答说：我给上海市委打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革命反革命是敌我矛盾，正确不正确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个问题，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区分开来，不能混淆不清，我已讲过多次了。

1966年11月间，谷牧同志根据周总理多次讲话精神起草的《工业交通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又称《十五条》）提出：“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周总理阅后同意。

1967年2月1日，周总理接见国务院工交口“造反派”时说：不能认为各部委、各省市的负责人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代理人，各省市统统都是“黑线”。如果那样看，十几年来毛主席的“红线”又体现在哪里呢？

1967年7月初，乔冠华同志就康生在6月的一次会议上给外交部扣上“三降一灭”的帽子（三降一灭，即投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扑灭人民革命运动），请示周总理：康生的提法到底指什么？周总理想了一阵后说：“三降一灭”不通。1971年5月底，周总理在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在谈到建国后外交工作的评价时说：“我不同意那种极左思潮的说法，

更不能同意‘5·16’反革命集团的说法，好像我国外交也是修正主义的路线。因为毛主席一直关心这条战线，亲自抓、亲自领导这条战线。”

1967年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讲话，号召“砸烂公、检、法”。他说：“整个17年来的公安工作是按照修正主义办的”，“毛主席思想在我们公安、政法系统没有占到统治地位”，“不把原来的政治、思想、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就永远跟不上毛主席思想”，“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在谢富治公开号召“砸烂公、检、法”以后，全国各地造反派冲击公、检、法机关，残害公、检、法人员日盛。8月24日，周总理在接见广西两派时指出：对公、检、法要一分为二，不能说没有好的。1971年1月29日深夜，周总理召集汪东兴等同志开会，谈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问题。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前公安工作的评价时说：“不能因为有修正主义路线干扰破坏，就说毛主席的路线不占统治地位。”指出：“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下，不能把毛主席的路线推翻。”1971年2月8日，周总理接见出席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全体代表，就建国以来公安工作的基本估计等发表讲话。他说：对这一时期的工作，要看主流，要看红线。“这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条红线领导全国，不然怎么会有今天？不能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是黑线统治着，这种说法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等于否认毛主席的领导，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尽管各省领导、各部领导大部分改变了，是不是说所有省、部都是资本主义复辟了呢？不能这样讲”。在谈到公安队伍情况时指出：就整个队伍看，还是好的。“不要以为公安干部都不好，那就危险了，那样就要扩大化”。

1970年1月27日，周总理在接见上海市和六机部代表就造船工业等问题讲话时说：“二十年来，在造船工业方面还是毛主席思想在领导；把造船工业说得一团漆黑，我对此有保留，搞一概否定不行”。

1970年8月16日，周总理在同国家体委军管会负责人和一些乒乓球队员谈话时指出：“建国后十七年的体育路线不都是修正主义的，还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由于坏人钻空子，搞了极左思潮，弄得一个时期思想比较混乱。”1971年7月，周总理修改国家体委一份工作报告，提出：建国后体育战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广大群众和多数干部中还是占了主导地位的”。

1971年7月6日，约见国务院全国教育会议领导小组成员，针对会议对解放后17年教育工作估计的争论，提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周总理的这个正确的估价，遭到张春桥、姚文元的反对，也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支持。

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方针政策，是任何一个严肃的政党必须遵循的原则。毛主席对党和国家政治形势估计错误，是导致十年内乱的一个根本原因。周总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为建国后17年全国各项工作实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修正主义路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发动“文化大革命”论点的否定。

三、党政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

尽管毛主席在《五·一六通知》中，对于从中央到基层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状况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估计，并导致严重后果，但是，毛主席并不主张打倒一切，对于有错误可以改正的干部，他还是要用的。林彪、江青一伙则不同，他们为了扫除篡党夺权的障碍，丧心病狂地迫害党政军干部，煽动造反派强加给他们“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叛徒”、“特务”等罪名，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各级领导干部被罢官、夺权，大批干部“靠边站”，有的被“专政”，有的被投进监狱，有的被迫害致死，造成乌云遮天的黑暗局面。大批党外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对于林彪、江青一伙这种倒行逆施，周总理表示坚决反对。他在多次接见北京和各地红卫兵以及各地区、各部门造反派代表时反复讲：建国后十七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主要的；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犯路线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要按敌我矛盾对待；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能一棍子打死，等等。不仅如此，周总理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保护遭受迫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保护和解放了大批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

红卫兵运动开始后，许多年幼无知的学生，在中央文革一伙人的煽动下，到处横冲直撞，不分青红皂白地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查“地富反坏右”，很快搞得人人自危，不得安宁。

1966年8月30日，章士钊先生写信给毛主席，反映8月29日夜被红卫兵抄家的情况。毛主席阅后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总理接到批示后，马上找来肇事的造反派，进行了严肃批评，责令他们立即送回被抄走的全部书籍，并派部队保护章宅。有了毛主席的批示，周总理就有了保护干部的依据。于是他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名单。要求对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知名人士和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常委，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均给予保护。名单开出后，嘱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把这份名单转交给统战部，要统战部照名单划定范围，把党外人士的名单开列出来。9月1日，又命301医院准备接收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知名人士入院，告以这些人年老多病，政府应负责保护。

在“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因派工作组到学校协助领导“文革”运动，被毛主席指责为“镇压学生运动”，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而导致在全国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风潮。从中央到地方大批党政领导干部受到批判。在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受到迫害和冲击的时候，周总理尽力予以保护。

1966年9月，周总理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参加红卫兵大会并发表讲话，突然会场上许多人呼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周总理立即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表示反对。直到会场平静下来，才继续讲话。他说：即使犯了路线错

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

1966年10月20日凌晨，周总理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代表，告诫他们不要到天安门贴刘少奇同志的大字报。指出：即使少奇同志有错误，我现在也无权回答你们的要求。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刘少奇同志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元首，即使要撤换，也不需要这样去发动群众。你们做事要慎重些。

1966年12月31日，周总理同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等人谈话，当有人提出：“刘少奇属于敌我矛盾”时，周总理说：我不这样看，不能把你们的观点强加于我。周总理还告诫蒯大富等人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标语贴到天安门去。

1966年10月9日，清华大学红卫兵要求王光美同志到该校去作检查。周总理接见他们的代表时说：王光美不能到清华去当场作检查，（批判）可以背靠背。12日，清华大学红卫兵又以发“请帖”名义，要求王光美去清华参加批判会，周总理批告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转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不要她去参加会议。”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造反派将王光美同志骗出中南海，然后挟持到清华大学批斗。周总理知道后，立即派童小鹏把王光美要回来。

1967年1月7日晚，周总理接见七机部两派代表，告诫他们：不要揪人，不仅谭震林、李富春副总理不能揪，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也不能揪，陶铸同志也不能揪。刘邓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我还要保。同日，北京建工学院红卫兵到中南海西门要求“揪刘少奇”，周总理接见他们的代表时说：你们可以送大字报，要揪不行。你们要照顾党和国家的影响。

1967年1月8日凌晨，在陈伯达、康生、江青的煽动下，北京和外地的造反派冲击中南海各个门口，要求揪斗“刘、邓、陶”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周总理把造反派代表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去，指出：冲击中南海的行为是错误的。党中央不同意揪斗刘邓陶。你们要揪斗的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都是处在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第一线，也不能揪斗。同日，周总理接见石油系统造反派代表，批评大庆油田造反派煽动工人离开油田、放弃生产的行为。当造反派呼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时，周总理立即背过身去，以示抗议。然后说：他们两位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判可以背靠背，不要用揪斗的办法。

1967年1月6日凌晨，在陈伯达、康生、江青的策动下，北京的造反派聚集中南海两个西门外，要求揪斗陶铸同志。周总理对着堵在西北门口的人群说：你们说陶铸同志是“叛徒”，我不知道，中央没有讨论过，我要向毛主席请示，现在不能回答你们。天快亮了，大家先回去休息。你们可推出代表，告诉国务院秘书厅吴庆彤同志，改日我接见。总理回办公室后，我与造反派商定了一个代表名单。1月7日周总理接见时指出：你们不要无根据地给陶铸同志乱扣帽子。陶铸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你们举行“批陶大会”不合适。因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1月23日，周总理在接见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时，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说：陶铸同志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我没有根据不信任他。

1967年6月中旬至8月5日，中央文革一伙人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策动上千个群众组织，一万余人，在中南海两个西门外安营扎寨，几十个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日夜狂吼，企图冲进中南海揪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同志。

当时我住在办公室，晚上休息必须服烈性安眠药才能入睡。高音喇叭对周总理的干扰可想而知。开始几天，高音喇叭播音从早晨七八点钟开始，午夜一两点钟结束。为了减轻对周总理的干扰，使周总理有一定休息时间，警卫部队曾奉命与围困中南海的组织者商谈：每晚零时至次日上午12时停止播音。那些造反派不但不接受意见，反而变本加厉，昼夜二十四小时连续不断地吼叫起来。他们的目的就是向周总理施加压力，逼迫周总理撤出中南海。可是，周总理为了保护刘、邓、陶和住在中南海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造反派围困中南海五十多天，他巍然不动。造反派始终不敢进入，从而保护了在中南海的许多中央领导人。后来，毛主席对此进行批评，造反派才散去。事后，周总理在国务院业务组的一次会议上说：戚本禹曾给我打电话，建议我搬到钓鱼台去住，我拒绝了。如果我离开中南海，造反派就会冲进来抓人，那全国还有什么地方不可以冲击？如果刘、邓、陶被揪走，那全国还有什么人不可以揪？如果国家首脑机关被造反派占领，那我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形象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毛主席不在北京，我如果撒手不管，那就是对党、对国家不负责任，就是犯罪！

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关于《永远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当时，党内政治生活十分不正常，极左思潮和个人崇拜已经发展到极点。对刘少奇同志的审查结论和组织处理，既没有经过核实，也没有进行认真地讨论，更没有听取刘少奇同志的申辩。刘少奇同志受尽折磨，于1969年11月12日在开封含冤逝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复查证明，这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有关决议是完全错误的，是党的历史上的一大冤案。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周总理遇到极大困难：或者赞成，或者反对，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为了避免与毛主席发生矛盾和冲突，以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通过决议时，他和其他中委一样表示赞成。当时表示反对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陈少敏同志。这件事对周总理来说是不得已的。如果他表示反对，就会立即被打倒。与他关系密切的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也会受到株连。中国就会成为中央文革一伙的天下，林彪一伙的天下。这对党和人民是十分不利的。周总理为人处事一向光明磊落，做出这样的选择是非常痛苦的。

在贺龙同志受迫害时，周总理将贺龙同志和夫人接到自己的住地——西花厅暂住，以后又送到西山保护起来。之后，造反派多次闹着要揪斗贺龙同志。2月18日、19日，周总理两次嘱秘书告诉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这是中央的决定。后来，林彪派人将贺龙同志抓走，总理未能继续保护下去。1967年4月28日，周总理和康生等接见国际关系学院代表，在谈到所谓“二月兵变”（这是康生等人给贺龙同志妄加的罪名）时指出：据我知道没有这件事。“备战、备荒、为人民”是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提出的方针嘛，是执行主席命令嘛。

1966年年底，周总理获悉彭德怀同志被北京的红卫兵从成都市抓走，即将押送北京。他立即要秘书给成都军区司令员、政委打电话：（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车站等候，指定卫戍区司

令员傅崇碧亲自去接，由卫戍区安排食宿，不许任何一派红卫兵插手。在火车抵达北京，傅崇碧同志去接时，北京各路造反派已云集车站，准备抢人。周总理亲自到车站做造反派的工作，最后同意他们派人与卫戍区共同管理，并约法三章：对彭德怀不许游斗，不准武斗，不准搞逼供信。这样，彭总暂时被“监护”起来，从1966年底到1967年7月由专案组管理之前，他没有受到后来那种非人的折磨与摧残。1972年1月，有关部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将彭德怀同志及其他被监护者，都转移到北京木樨地附近的一个单位，彭总等人的居住、饮食等都有所改善，并配备了医护人员。

1967年1月3日、4日，周总理三次同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造反派谈话，说服他们取消将于1月5日召开的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出：把批判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两位副主席是指错了方向。把叶、陈当作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终于说服造反派答应延期召开这个会议。

彭真同志被撤职后，周总理通知卫戍区照样派警卫部队在他的住地保护。1966年12月4日，江青、戚本禹指使红卫兵将彭真同志抓走，不知去向。周总理立即下令寻找，查到下落后，派部队把彭真同志要回，保护起来。同日，被绑架的还有刘仁、万里、林默涵、夏衍、田汉、许力群等同志。周总理指示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立即把他们找回来，指出：“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抓人。”

从1967年1月开始，在毛主席支持下，中央文革一伙在全国发动了“全面夺权”。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的党政领导权被造反派强夺，大批老干部遭到残酷迫害，全国陷入一片混乱。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以下简称三老四帅），先后于1月中、下旬和2月11日、16日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就“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应不应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同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展开面对面的抗争，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和林彪、江青一伙的围攻批判，并定罪为“二月逆流”。周总理看到这样对抗下去十分不利，于是说服三老四帅主动向毛主席做检查，保护他们过关。三老四帅在得到毛主席谅解后，周总理又趁热打铁，提出“五一”节联欢晚会让三老四帅出席的名单，毛主席十分爽快地签了“同意”二字。周总理以他超群的斗争策略，巧妙地化解了矛盾，保护这批共和国元勋度过了险关，也打破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借毛主席的手铲除三老四帅的阴谋。

1967年5月5日，周总理致信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李富春同志，提醒他们注意，不要因“五一团结”（指“五一”天安门烟火晚会）而造成错觉，否则，“那就要来一个新的反复。”

三老四帅取得毛主席谅解后，林彪、江青一伙仍不死心，他们策动造反派继续纠缠不休，妄图打倒这些老革命家。周总理坚决进行保护，同林彪、江青一伙展开了激烈地斗争。

在江青、康生等人的策划下，外事口和外交部的造反派执意要“打倒陈毅”同志。

1967年5月11日，周总理接见外事口造反派代表，劝说他们不要开大会揪斗陈毅同志。指出：揪斗陈毅，中央不能同意。会上，造反派围攻周总理，并企图把“陈毅是三反分子”的说法强加于周总理。周总理愤然指出：

我没有讲“陈毅是三反分子”，你们强加于我，我要抗议。

1967年5月15日凌晨，周总理接见外国语学院造反派代表，严厉批评他们为揪陈毅而冲击外交部，说：我把政策交代了，你们不听，要走向反面。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就倒了？没有这么简单！我马上下命令，让部队加强对外交部的保卫。以后谁也不能去，谁去扣留谁。

周总理为了保护陈老总，曾先后四次参加陈毅作自我批评和接受批判的大会。例如，1967年8月11日，外事口“批陈联络站”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批陈”大会。事先，周总理曾向造反派头头重申：不许呼喊“打倒陈毅”的口号，不许挂“打倒陈毅”的标语，不许有侮辱人格的举动。他们表示遵守。然而造反派头头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在会议中间，突然从大礼堂二楼吊下许多“打倒陈毅”的大标语，还有几个造反派要上台对陈老总搞武斗，当即遭到警卫人员的拦阻。周总理严肃地批评造反派不讲信用，并指示有关人员保护好陈毅同志。然后愤然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外事口另一派定于8月27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批陈大会”，周总理准备参加。但是，外事口“批陈联络站”头头们提出无理要求，进行阻挠。当日凌晨，已经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的周总理接见“批陈联络站”的头头们，试图说服他们不要阻挠。但是，他们不但不听，而且威胁说：“要组织群众冲击会场”。周总理愤怒地说：你们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从26日下午两点到现在，我已连续工作18个小时，我的身体不能支持了。周总理感到心脏不适，服药后仍未好转。但造反派继续纠缠，置之不理，致使周总理心脏病发作。在场的保健医生搀扶周总理离开会场。造反派仍不罢休，他们叫喊：“我们就是要拦陈毅的汽车”，“还要冲击会场”。走到会议厅门口的周总理转身怒斥：“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这次，周总理因病一天半不能工作。周总理委托李富春同志参加了当天晚上的“批陈”大会。

在1967年8、9两个月的40多天里，陈老总共接受大小会批判八次，在周总理的精心安排和保护下，陈毅同志虽也曾遇到被“揪”之险，但人身安全得到保障。

1967年1月上旬，周总理得知造反派抄陈云同志家的消息后，立即派童小鹏前去制止。又指示杨德中把陈云同志从新六所住地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1967年3月21日，周总理接见财贸口造反派和各部党组成员时，针对造反派提出要批判陈云同志和把批判李先念同志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明确指出：我不能回答。中央常委内部问题，由中央决定。中央常委没有决定批判陈云同志。李先念是副总理，中央还信任他嘛。我是不主张大字报上街的。

1967年5月4日，周总理接见财贸口群众组织代表，不同意造反派成立“批李先念联络站”。在谈到对“二月逆流”的看法时说：那是认识 and 观点不同，没有什么原则问题，倾向性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先念同志是人民内部矛盾，看人不仅看一时，还要看他的整个历史。

1967年6月16日，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严厉批评他们不听劝阻，在13日执意召开“打倒李先念”大会，说：“打倒李先念”，我不赞成。你们不调查，不核实，随便把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说成是“叛徒头子”，这谁高兴？敌人高兴。

1967年6月11日、13日，周总理接见农林口造反派，针对造反派提出

要揪出谭震林，说：你们写的谭震林同志的材料，我看过了，还要核实，结论不能作这么早。

1967年6月3日晚10时至次日凌晨4时，周总理接见国防工业系统群众组织代表和军管会代表，指出：七机部“9·16”在国防部门口用大喇叭“炮轰聂荣臻”，是错误的，是极左倾向，你们要承认错误。

1966年11月17日，周总理接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卫兵代表，批评他们冲击国防科委，指出：国防科委、国家科委在聂荣臻元帅的领导下，成绩是主要的，原子弹、导弹都上了天，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是毛泽东思想。

1967年7月31日，林彪、江青等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出席纪念“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周总理请示在外地的毛主席。毛主席指示：朱德、徐向前及其他受冲击的老帅都要出席。周总理亲自通知徐向前同志，并指示有关部门选好从徐帅住处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以防意外。

1967年10月，在江青唆使下，北京“天派”学生准备前往北京西山搜查老师们的住所。周总理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派两个团去警卫、劝阻。周总理在深夜亲自带领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到老师们的住所视察警卫工作，作具体指示。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认识到以所谓“二月逆流”，整三老四帅，搞错了。他说：“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它的性质是老师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制造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诬陷薄一波等同志。周总理得知红卫兵因这件事揪斗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时，于1966年11月24日，就刘澜涛等同志出狱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北局的电报指出：“刘澜涛同志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在将电报稿送毛主席审批时，又附信说明：此事“七大”、“八大”均已以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主席当天批示：“照办”。11月30日中共中央分别给西北局和吉林省委发去电报。

薄一波同志在这个重大冤案中横遭迫害，周总理积极设法保护。先是借薄一波同志身体不好，要他去广州休养六个月，实际上是让他避开红卫兵的揪斗。康生知道薄一波同志去广州后，策动国家经委造反派到广州去抓。周总理立即指示：“应由广州军区派部队按接送彭德怀的三条，送薄回北京”。薄一波同志到京后，又被康生一伙投入北京的一个监狱，倍受折磨。在周总理多次关照下，薄一波同志被安排住进医院治疗。

1967年，周总理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对罗瑞卿同志“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周总理得知罗瑞卿同志手术后伤口未愈，造反派惨无人道，仍要他参加批斗会。指示：“伤口未愈，不能批斗。”

1966年9月1日，周总理出席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在讲话中要求红卫兵执行党的政策。他强调指出：应当尊重宋庆龄，她是孙中山的夫人。她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这是不对的，我们无

论如何要劝阻。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对于安全受到威胁的宋庆龄、郭沫若等著名人士，在他们的住地，派卫戍区部队加以保护。有的送解放军总医院加以保护。对不愿离家的，派解放军战士或公安人员身着便装，臂戴红袖章，到被保护人家中，劝阻前来抄家的红卫兵。对傅作义、邵力子、蔡廷锴、蒋光鼐、沙千里等同志都采取了这种保护措施。使他们较为安全地度过红卫兵运动的高潮。

在西藏的阿沛·阿旺晋美同志的安全受到威胁时，周总理决定派专机把他们接来北京，加以保护。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沈雁冰（茅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康生、陈伯达妄加“反革命嫌疑”罪名，逮捕入狱。专案组审查几年无结论。1973年周总理过问，公安部查明是一起错案。周总理得到公安部的报告后，立即报送中央批准予以释放，并给予参加政治活动的机会，名字见报后恢复了名誉。

1967年上半年，在国务院一些部长、副部长遭到轮番揪斗，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周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同志先后把他们接到中南海休息，少则几天，一般两三个星期，个别的住一两年。据不完全统计，到中南海“避难”的有：王震、陈正人、廖承志、方毅、姚依林、康世恩、刘宁一、周荣鑫、段君毅、吕东、王诤、刘澜波、钱之光、邱创成、江一真、王磊、孙正、钱信忠、钱正英、周子健、萧望东、林乎加、萧鹏、刘建章、王子纲、徐今强、李人俊、江学斌、饶兴、刘秉彦等。余秋里、谷牧协助周总理抓经济工作，常住中南海，不能回家，有时白天挨批斗，晚上回中南海工作。

1967年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非法关押在北京矿业学院时死亡。周总理得知后悲愤地说：“这个同志死的不明不白，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当即要公安部负责查明死亡原因。之后，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多次谈到张霖之的死，说：我很难过，对于部不能这样斗，不能用敌视的眼光看待老干部，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由于调查工作迟迟没有结果，1970年周总理责成煤炭部军代表继续追查。7月31日周总理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审查煤炭部军代表给国务院的两次报告，以及住矿业学院工、军宣队的报告。会议作出结论，主要内容是：张霖之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1967年1月，张被非法关押在北京矿业学院时，由于戚本禹的威胁和煽动，在武斗和逼供的混乱中死去。兹决定张霖之同志的死亡，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张霖之同志的家属和他的子女不受任何牵连，应按革命干部家属看待。

1967年2月2日，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赵尔陆同志在连遭批斗后死亡。周总理得知后，立即要有关部门查明死亡原因，并要看尸体解剖化验结果。2月6日，参加了赵尔陆同志的追悼会。1968年4月20日，周总理在接见国防科委等部门群众组织代表时说：赵尔陆同志死了，有人还要打倒他。说句公道话，这个同志一直在后勤工作，勤勤恳恳。活人要保，死的也要保。

在一些大区中央局、省市自治区领导人被夺权，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处境十分困难时，周总理在报请毛主席同意后，分别把他们接到北京。有的安置在京西宾馆，有的安置在中直招待所等地方，保护起来，并派专人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据不完全统计，受到这种保护的有：李井泉、宋任穷、张体学、张平化、叶飞、江华、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欧

阳钦、黄火青、黄欧东、曾希圣、廖志高、霍士廉、王鹤寿、杨超、高克林等同志。

1967年8月，周总理得知住中直招待所的李井泉等几位大区和省、市负责人被造反派抓走，并进行游斗，立即指示傅崇碧同志派部队保护他们。还指示把王任重、江渭清等20多位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转移到卫戍区部队一个安全住所，并嘱要严格保密。江青等连续两天在中央的会议上，当着周总理的面，向傅崇碧追问这些人的下落。后来，毛主席表示赞同周总理的措施，江青才停止追查。

1967年8月25日，江青反对周总理要宋任穷同志回辽宁工作，指使造反派夜间闯入京西宾馆，绑架宋任穷、陈锡联等同志。周总理得知后，命傅崇碧同志带人将宋、陈从造反派手中救出。次日凌晨，周总理在接见辽宁造反派代表时，对此提出严肃批评：这种办法，不是无产阶级政治，说坏一点，是国民党特务作风！

1967年夏，中共东北局书记欧阳钦同志因病住进北京空军总院治疗。东北三省几个大学的造反派，到空军总院要揪欧阳钦同志去沈阳批斗。周总理得到报告后指示：欧阳钦同志有病，不能回东北接受批判，待病愈后再回去。我奉命去空军医院向造反派传达周总理的指示，并说服他们按总理指示办。

后来，周总理将在京保护的部分大区、省、市、自治区领导同志分散安排到毛主席亲自抓的“点”，也就是北京的六个工厂去“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实际上是保护起来。这六个工厂是毛主席抓的点，造反派不敢到那里去抓人，实际上是“安全岛”。

1967年1月29日，周总理接见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造反派时说：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为什么不能唱？人家有一点错误，就连他作词的歌子也不能唱了？要唱，我还要唱呢。萧华是人民内部矛盾，他过去是“红小鬼”。1967年3月3日，周总理出席萧华同志的检查会并讲话说：萧华同志犯错误是不自觉的，缺乏经验。他是个“红小鬼”，从他整个历史看是光荣的。不要用放大镜看一个人眼前的错误，要看他的整个历史。还说：抄萧华同志的家是股“妖风”。

1967年1月，周总理与叶剑英同志商定，以治病为名，将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接来北京保护。

1967年7月24日，周总理安排抵京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等12人住在京西宾馆。周总理得知中央文革小组怂恿造反派包围、冲击京西宾馆，欲将陈再道揪出批斗后，要傅崇碧同志立即赶往现场，并交代说：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把人抢走，一定要保护好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之后，周总理又责令戚本禹前去处理，说：“人要是被抓走了，你必须向毛主席做出交代”。戚本禹被迫到现场，叫造反派退出。

1968年3月，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受到造反派的围攻，安全受到威胁时，毛主席、周总理把许世友同志接来北京，安置在中南海休息了一两个月。

1968年12月26日，毛主席指示：“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悔改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是坏人。”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成为周总理在干部问题上同林彪、江青一伙斗争的有力武器，成为解放干部的重要依据。

1970年，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在驻石家庄地区某部被“软禁”时将

腿摔断。周总理得知后，立即派飞机将他接回北京，送 301 医院治疗。

1970 年 4 月初，周总理在《张学思病情恶化的报告》上批示：“要告诉医院，设法进行抢救。如果他们力量不够，可以请 301 或其它医院一块儿进行抢救。”据此，张所在医院提出救治方案，但遭到林彪一伙阻挠。5 月下旬，张学思同志病危，临终前表示：“非常感谢毛主席和周总理”，同时对林彪等人强加于他的罪名——批驳，说：“问题迟早总会弄清楚”。5 月 29 日，张学思同志在医院病逝。

1970 年 3 月 4 日，周总理就数学家华罗庚来信反映其数学手稿被盗事，批示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和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首先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次之，应追查他的手稿被盗线索，力求破案。

1971 年 8 月 9 日，周总理陪缅甸总理奈温到广州，得悉粤剧名演员红线女从五七干校回来，仍不让她演出，在剧团干杂务。周总理提出让红线女在欢迎奈温的文艺晚会上演出节目。从此，恢复了红线女的演出权利。

1972 年 10 月，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多次过问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作曲家贺绿汀的问题，催促尽快结案。1973 年 1 月，在毛主席过问、周总理多次催促下，贺绿汀被解除监禁。

1971 年，周总理得悉著名彝族女演员杨丽坤在“文革”中受迫害造成的病情，打电话给云南省革委会，要求有关部门负责杨的治疗。

周总理不仅保护了大批党政领导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科学家、艺术家，还保护劳动模范，如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同志，北京市的掏粪工人石传祥同志等。

1970 年 2 月，周总理对进驻各民主党派机关军代表指示：对民主人士不能那样随便揪斗。如果民主人士有政治历史问题，可以背靠背地进行审查。历史问题，既往不咎。如有现行反革命，另当别论。之后，又几次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把下放劳动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以上人员，从五七干校抽调回来。

1972 年 4 月原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和原内务部部长曾山相继因心脏病去世。周总理在不到十天的时间，连续参加两位老部长的追悼会，既悲痛又震惊！周总理与国务院其它领导同志商定，通知在“五七”干校和疏散在各地的国务院各部委副部级以上干部回京，普遍检查一次身体，并改善他们的保健和医疗条件。同时，周总理还指示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对上层爱国人士的医疗、生活状况进行调查，对存在的困难及时加以解决。国务院办公厅和政工小组向国务院各部门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请卫生部安排医院承担这一任务。卫生部安排了十家医院负责为这些同志检查身体。

1973 年 3 月，教育部部长何伟又因心脏病突然病逝，周总理严肃批评了未落实好医疗保健工作，提出卫生部对党内老干部以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常委中的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一次全面身体检查，具体工作由北京医院负责。“文革”中一度废止的高级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医疗制度得以恢复。

1972 年 3 月，周总理看了在押的原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逝世的报告，提出：全面检查一下被拘留、关押、监护、隔离人员的身体情况，有病的治病，病重的住院，身体不好的加点营养，不要等病危再去医院治疗。周总理关心这些人的健康和医疗问题，不仅是出于人道主义，更主要的是他对强加于这些人的罪名是不相信的。可是，在江青一伙还在台上的时候，立即释放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只能设法减少他们的痛苦，减少疾病和死亡。历史已经证明，“文革”期间失去自由的老干部，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的死党外，都是好同志，是冤假错案。

1972年12月18日，毛主席将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妻子刘淑清反映监狱虐待在押人员的来信送给周总理，毛主席批示：“应一律废除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当日，周总理批告李震、杨杰、吴庆彤办三件事：（一）将刘建章保外就医，并通知其家属、子女前去看望。（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李先念、纪登奎批。（三）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他在国务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对在押人员的待遇问题，在年内再作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在押人员都要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如有违犯者，当依法惩治，并容许犯人控诉。当时，我约李震、杨杰和中央专案组负责人到国务院会议厅，向他们传达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并商定分别办理周总理提出的各项任务。此后，对在押受审人员的残酷迫害，有所改变。

1973年1月8日，周总理审阅公安部《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对监管工作重要指示的报告》时批示：同意将秦城监狱收归公安部直辖，要求在一个月内存整好，并定出新的规章，严格遵守。允许各省来开监管工作会议的人参观、批评和学习。同时建议卫生部再拨出两个医院的部分病床，接收在押人员住院治疗。秦城监狱经过整顿，在押人员的居住、饮食、医疗卫生条件均有所改善。

1973年年初，周总理约负责组织工作的纪登奎同志谈话提出：现在还有很多省部级干部没有解放，而各方面的工作又很需要这些有经验的老同志出来工作，要抓紧时间解放一批老干部，并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到1973年7月，中组部、国务院业务组、总政治部分别提出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正副职、中直各部门正副职、国务院各部委正副职和军队正军职以上待解放的名单，共约三百多人。在周总理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这个名单。在讨论中，江青、张春桥等人屡屡作梗，百般阻挠。参加会议的叶剑英同志作《过桥》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表示愤慨。由于周总理、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据理力争，最终还是解放了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当时国务院业务组提到会议上151人，我奉命向中央政治局会议汇报情况，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解放97人。所谓解放，即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阅读党内文件，按原级别发工资，分配适当工作或安置休养。

1973年5月20—23日，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周总理宣布，经毛主席批准、谭震林、乌兰夫等十三人予以解放，分配工作。

1975年2月底3月初，周总理连续约纪登奎、吴德、华国锋同志谈关于中央所管专案审查对象的处理意见，指示应尽快结束专案审查。3月7日，周总理审阅修改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3月6日写给中央的《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根据毛主席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由中央专案第一、第三办公室和“五·一六”专案组所管670名审查对象，“大多数人的问题已基本查清”。“对上述审查对象，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拟继续关押审查外，绝大多数予以释放。这些人，凡是专案组能够做出结论的，应做出结论；一时还不能做出结论的，应先放出来，以后均由中组部会同有关机关和人员再作结论”。“这些人放了以后，中央专案一办、三办和“五·一六”专案组即行撤销。《报告》还对不同类别的审查对象，提出具体处理的意见。周总理在“人民内部矛盾”一类中，加上“凡属问题性质严重而作人民内部矛盾

处理的，应予释放，并将其结论在适当范围内公布”。

周总理为了加快解放干部的进度，指示在京的中央党政军、统战、文教、科学等系统和北京市，利用国庆节、五一节等重大节日，让应当解放而尚未解放的高级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文化、教育、科学各条战线的知名人士参加招待会等活动，会将名单登报。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党、政、军有关部门每年国庆、五一部提出一个大名单，送周总理审阅。他不仅同意，常常还增加一些人。例如，1974年国庆节招待会名单，周总理在医院审阅后，提出增加起义将领四夫人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张学良之弟）。还有齐燕铭同志。这样就起到了解放干部、恢复名誉的作用。

不仅如此，周总理还利用其它机会解放干部。例如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地震后，立即组成以副总理华国锋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前赴灾区慰问。那时周总理正在住医院。慰问团出发后，将名单报送周总理。他阅后指示：吕正操同志是海城人，中央慰问团应增加吕正操同志，并任副团长，让他与灾区群众见见面，并发表讲话，然后作新闻报导，以恢复名誉。之后，立即派专机送吕正操同志去辽宁灾区，参加中央慰问团的活动。

由于周总理的努力，保护和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保护了许多爱国民主人士。但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仍然有大量冤假错案没有平反，还有许多老干部没有解放。

周总理在保护老干部中，最大的贡献是用各种办法保护邓小平同志，在时机到来时，及时向毛主席提出建议，促成了邓小平同志的复出，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第二代领导核心，为彻底纠正“文革”的错误，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创造了先决条件。

1969年初，因“战备疏散”，邓小平同志一家被安排去江西省，周总理接连给江西省负责人打电话，对邓小平同志一家的安排做出具体指示。他否定了在赣州安置的方案，提出在南昌市郊选一个地方。后来邓小平同志一家被安置在驻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某步兵学校校长的一套住宅，其条件基本符合周总理的要求。邓小平同志的“劳动”点拖拉机修配厂，离其住处不远。

1972年春，王震同志给毛主席写信建议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王震同志要我一位字写得工整的人抄清，并说：“此事请示过周总理，总理说可以给毛主席写信”。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同志写信给毛主席，在批判林彪的同时，希望做点工作。8月14日，毛主席阅后批给周总理，对邓小平同志的历史作了四条评价（即：在中央苏区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没有历史问题，有战功，建国后没有屈服于苏联的压力）。周总理立即把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信印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15日，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同时以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立即解除对邓小平同志的监督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当年12月，周总理与纪登奎、汪东兴同志共同研究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问题。之后，纪登奎、汪东兴同志写了一封建议信，提出邓小平同志仍任副总理。周总理看了以后，又取得毛主席的同意，终于在1973年3月1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以后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更加信任，让他担任党政军重要职务。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重新

委以重任，与周总理不失时机地向毛主席进言有着密切关系。

在“文革”期间，周总理千方百计地保护党和国家领导人，保护和解放老干部，保护爱国民主人士的事例太多了，不可能全部列举。可以说，在“文革”中幸存的或逝世的省、部、大军区以上党、政、军各方面的大批老干部，以及高层的爱国民主人士，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过周总理的关怀和保护。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为保护党和国家领导人，保护革命老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作出的历史贡献。

四、要不要全面夺权？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对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领导干部，采取敌视态度，他们主张全面夺权，改朝换代，由所谓左派（即造反派）掌权。所谓左派，就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反，造社会主义法制的反，残酷迫害革命老干部的阴谋家、野心家、法西斯分子。由这些人掌权，中国将变成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国家。不幸的是，当时毛主席已经不信任多数党政领导干部，而信任这些所谓左派，因此他支持“踢开党委闹革命”，支持全面夺权。结果造成全国范围的大混乱，并激化了两派矛盾，发生全面内战。

1966年10月5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称：根据林彪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紧急指示》还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央批示提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自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说《紧急指示》适用于一切单位。以后，造反派即在全国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狂潮。取消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是“全面夺权”的一个重要步骤。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篡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毛主席支持并批准上海的夺权行动。1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同日，毛主席在党中央碰头会上说：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展开全面的夺权斗争”。此后，全国掀起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各行各业的全面夺权风暴，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狂潮泛滥，社会陷入空前混乱。

1967年1月，周总理与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各省造反派代表时，北京市的造反派夺了新市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权，夺权的人前来报“喜”。周总理当即指出：“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政府业务的监督权。党的领导权不能夺，政府业务的领导权不能夺。”江青马上插话说：“一切权都要夺，统统地夺。”当时我在场。我看到在夺权问题上周总理与中央文革是不一致的。这种分歧已经暴露在群众中，可见矛盾已经很尖锐。

当国务院各部委的造反派纷纷夺取本部委的领导权的时候，周总理在一些群众代表会上反复讲：党中央的权不能夺，党的领导权不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可以夺；政府业务、生产的领导权不能夺，只能监督；属于中央的外交、国防、财政、公安和宣传工具的领导权不能夺，监督也必须加以限制。

1967年1月28日，周总理接见国务院工交口造反派代表时说：“夺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前提。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当权派要分清性质，区别对待。不能把各级当权派都看成是资产阶级当权派。”同日，周总理接见浙江省造反派，要求冲入省军区的群众立即撤出。说：“什么问题都说是刘、邓路线，这样不科学。不可能掌权者都是走资派，不能把

所有领导干部都一脚踢开”。夺权怎么夺，我们有五点建议：（一）要发动群众，自下而上。要联合起来。条件不成熟，联合不起来的，暂时不能夺权。（二）以造反派为核心，团结大多数。（三）以本单位造反派为主，外单位造反派为辅。（四）夺权一般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夺生产、业务的监督权。（五）省、地、县自上而下地夺。谈到干部问题时说：浙江省委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江华同志是井冈山的老同志，是少数民族，毛主席再三说要保。

1967年1月31日，周总理接见华北局造反派时说：“不能夺华北局书记处的权，华北局是党中央的派出机关，你们夺权就等于夺党中央的权。”

1967年2月7日，周总理在审改关于驻外使馆、代办处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稿时指出：备驻外使馆、代办处仍应坚决执行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五大”的规定。使馆内不建立战斗组织，不能进行夺权。已建立战斗组织的，应当在使馆党委领导下转为“文化大革命”学习小组，对党委有批评、建议之权，无监督权。不容许直接干涉使馆党委行使职权。

1967年2月7、8日，周总理约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同新疆自治区负责人谈新疆问题，认为自治区夺权不成熟，拟对新疆自治区和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管，以推动和促进军于群三结合。

1967年2月17日晚至18日凌晨，周总理、李先念同志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时，当场下令逮捕操纵造反派夺财政部大权的副部长杜向光。此前，周总理得知杜向光要夺财政部大权后，曾让李先念同志约杜谈话，向他发出警告。但杜不听警告，并以念毛主席语录进行对抗。本次接见我作为工作人员在现场。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接见的是造反派代表，没有请杜，他却来了，要他退场，他赖着不走。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才下令逮捕杜向光。周总理说，我在几次座谈会上都说过，财政大权不能夺，财政部是代表中央执行财权的。我要提醒你们：你们要走到邪路上去了。我申明没有经过中央承认的夺权，都不算数，要一个一个地审查。财政部、商业部的党组要恢复，党组还要行使职权，还是由李先念、吴波、姚依林同志负责。其它取消党组的部委也必须恢复，负责的还是部长、司长。又说，你们对姚依林同志的通缉令要取消。你们以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领导干部，一斗十几天不放，戴高帽、挂黑牌、搞喷气式，这样搞法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老干部都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要犯罪。

18日凌晨，周总理接见财贸日司局长以上干部，提出：夺权发生了偏差，我们要纠正。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中央的权，党的领导权不能夺，政府的财政、公安、外交、国防大权不能夺。造反派只能监督业务，不能超越这个界限。财政大权不能夺，全部监督也不行。又说：对有错误的干部，不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能无休止的斗争。这不是党和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所要采取的方法。

1967年2月18日，周总理接见国防工业口代表，得知二机部造反派夺了党组领导权时说：你们简直没边了！部党组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部党组“靠边站”。允许你们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业务只能监督。重申：“财政、外交、国防、公安、国防工业、宣传大权属于中央，你们不能夺。”又说：国防工业各部部长、司局长，除中央已经宣布停职反省的以

外，你们一个也不能扣留。否则，你们就要犯错误。没经中央批准，你们宣布罢官是不算数的。现在对干部的斗争方式已经发展到打人、挂牌、游街。这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我看了心里很难过。如果不指出来，再这样发展下去，我就有罪了。

1967年2月18日，周总理审阅《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社论提出：干部队伍中的大多数是好的，在夺权斗争中必须从这样一个正确估计去对待干部。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切怀疑，一概否定，排斥、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一脚踢开，一棍子打死，这是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阅后送毛主席审批时注明：“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提议在党、政、军、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毛主席阅批：“同意你的意见，讨论后发表，并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以后重要的社论都应这样做。”3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这一社论。

1967年2月20日，周总理在关于山西省夺权情况介绍会上说：现在有连锁反应。自一月份夺权以来，不管这个部门有没有走资派，造反派都要夺权。有些地方对带长字的、第一书记就要夺权，这样一解释，全党、全国还成什么样子？不能这样，逻辑上站不往嘛！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并不都是走资派。造反派权掌多了，要加以限制。现在有的造反派要夺中央的大权。中央的党权、财权、外交权、文权不能夺。军事大权是中央的，夺军区的权，造军区的反，完全是大方向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

1967年2月26日，周总理与广东省、广州军区负责人谈话后，致信毛主席，认为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造反派“让权”是错误的。广东局势不宜久拖。建议立即对广东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此外，对同广东情况类似的云南亦先行军管。毛主席阅批：“同意这样做”。28日，周总理再同广东省委、广州军区负责人谈话，宣布由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组织对广东省实行军管。下面设两个班子，一个抓“文化大革命”，一个抓业务。

1967年3月1日，周总理召集工交口各部部长和造反派代表会议，听取各部业务情况汇报。说：我向主席谈了各部业务工作情况，认为各部还是业务监督为好，主席同意了。对造反派说：现在不许乱揪人了，国务院要你们保证他们不被揪。打、砸、抢、抄、揪这股风一定要刹住。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不能都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如果这样，以后谁还讲话？那不是提倡奴隶主义吗？不要把一切错误都推给当权派。又说：现在，业务工作已经耽误了。各部要恢复正常秩序，部级、司局级干部要恢复工作。

1967年3月13日，周总理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呼吁：无论如何要在三月份解决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机构问题，以便抓革命、促生产。各级领导机构成员要以解放军为主，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如果没有领导机构，可以先成立生产指挥部。现在就抓，不能再晚了。又说：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管。各地军管会要帮助当地领导干部出来“亮相”。各单位群众组织必须归口。对反动组织，对严重违法乱纪和泄露国家机密的，应予逮捕法办。

由于全面夺权，使全国各级党政机关陷入瘫痪状态，从而引起社会的大动乱。最后毛主席接受了周总理的建议，对于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党政

机关和铁路、交通等要害单位实行军事管制。此后，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铁路、交通、邮电、军工企业和其它重点企业，陆续实行军管。这标志着全面夺权的失败。

但是，江青反革命集团不死心，他们成心要乱党、乱军、乱国。外交部由于工作特殊，不宜实行军管。江青一伙为了打倒周总理、陈毅同志，策划夺取外交大权，搞乱外交工作。1967年6月，康生首先给外交部扣上“三降一灭”的帽子。8月7日，王力接见外交部“造反派”，煽动夺外交部大权。次日，王力将讲话内容分别向江青、陈伯达作了汇报，江、陈表示支持。8月8日，周总理看到王力的“八·七”讲话的传单后，批给康生、王力，提议三人一谈，但康、王未到。康生还说：王力的讲话同主席的精神是一致的。8月19日外交部造反派冲砸外交部政治部，宣布夺取外交部党委大权，并强行封闭了所有副部长办公室。8月23日凌晨，周总理得悉22日晚，北京造反派和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表处后，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对此事和夺外交大权提出严厉批评。说：你们目无中央，是无政府主义。我们没有料到你们会来这一手（指夺外交部的权），事先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报告。你们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义发电报给国外，完全是不合法的，不算数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来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利，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权力，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我在你们心里没有威信，中央文革与我之间，你们没有任何空子可钻。又说：“七·二”以后，这个浪潮不正常，对形势的根本估计不对。什么“全国处在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揪军内一小撮”，完全不对。

8月24日，周总理找由上海回北京的杨成武同志单独谈话，讲了各省的情况，王力8月7日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刘少奇等事，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会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要杨成武同志即去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并将王力的“八·七”讲话给杨转送毛主席。25日杨成武同志飞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后，毛主席对杨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你回去请总理办。”毛主席对王力8月7日讲话批：“大、大、大毒草”。稍后又对杨说，戚的问题稍缓一下处理。当天中午，杨成武同志回到北京，单独向周总理汇报了毛主席的决定。当晚，周总理主持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会上，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随后便将王力、关锋隔离审查。翌年一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1967年8月31日，周总理接见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和部党组成员，重申外交大权属于中央，并严厉批评那个在外交部“夺权”后，“代理外交部长”一职的造反派头头姚登山，说：你最近到处讲话、作报告，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现在国内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国家的信誉。

五、工交企业和农村社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

工交企业和农村社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从“文革”开始就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和斗争。林彪、江青一伙只管“文化大革的”，根本不考虑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他们把经济搞乱，却不负任何责任。可是，作为人民的总理周恩来同志，始终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他要尽可能减少“文化大革命”对生产建设事业的破坏，尽可能使国民经济能够继续运行，不至于完全瘫痪，以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为此，周总理与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场斗争前后经历了三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在1966年6、7月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北京等大城市青年学生首先起来“造反”，混乱现象迅速从北京等大城市蔓延到全国，从学校扩展到社会，全国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单位开始受到影响。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就向毛主席写信：在京的同志讨论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和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四清’部署，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并草拟了一个通知稿送毛主席审核。毛主席7月2日在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信上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应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7月22日，中央又发了一个补充通知。两个通知规定：“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要在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条件下，结合四清运动，分期分批开展文化大革命”，从而限制了“文化大革命”的范围，制约了“文化大革命”对生产建设的破坏性影响。以后，由于毛主席对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严厉批评，各地开始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8月份开始，毛主席为了进一步发动“文化大革命”，开始接见来京的各地红卫兵和学校师生，北京的学生纷纷到外地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各地红卫兵和学校师生也开始了全国大串连。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他们到处造反，揪斗所谓“走资派”，使中央和地方的许多党政机关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交通运输陷入了空前的大混乱。部分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停工停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规定已经被冲垮。

1966年9月初，李富春同志提议，经周总理和毛主席同意，调余秋里、谷牧同志到国务院协助抓经济工作。周总理对他们说：你们可得帮助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无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红卫兵大串连高潮开始后，为减轻铁路运输的压力，维持起码的生产建设物资运输任务，周总理要求谷牧同志组织力量，编制铁路运输计划明细表，并多次指出：“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须的货运力量，然后安排好客运计划；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然而，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主席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总共约1100多万人次，对生产建设，对人民生活，必然

带来很大影响。

第二个回合发生在 1966 年 9 月，为了防止学校的极左行为蔓延到农村和工交企业去，9 月初，陶铸同志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组织、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经中央碰头会讨论后，报毛主席批准发布。这两个中央文件规定：“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运动的布置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和红卫兵均不得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各生产企业和科学研究所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应迅速返回原单位。学生和红卫兵不要进入厂矿企业、科研单位去串连等等。这两个文件的下达，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文化大革命”对生产的破坏，但也招致江青一伙疯狂的反对。江青曾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大吵大闹，逼迫周总理、陶铸同志表态，取消上述限制“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这理所当然地遭到拒绝。

1966 年 11 月 9 日，周总理主持讨论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按照周总理意见定稿的这篇社论指出：“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搞“文化大革命”，“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第三个回合发生在 1966 年 11 月。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王力等人起草了旨在取消对工交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限制性规定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 12 条指示》草稿。周总理把这个草稿交给由谷牧同志主持的工交座谈会进行讨论。与会者对此稿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别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内容表示强烈反对。会议期间，周总理会见了参加座谈会人员，并发表了讲话。他说：当前的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要大家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根据会议意见和周总理的多次讲话精神，谷牧同志起草了《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又称 15 条）。《15 条》提出“17 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规定：（一）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文化大革命”；（二）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三）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15 条》遭到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对和指责。11 月 22 日，周总理、李富春同志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后表示：（一）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二）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三）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同志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 12 月份发出；（四）原稿子把当权派划宽了，同意把“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等几类人去掉。毛主席还说：《15 条》不行可以另写，讨论出来看看。之后，陈伯达急不可待地以原 12 条为基础，修改为《工业 10 条》草案，上报中央。12 月 4 日至 6 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谷牧同志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和讨论通过陈伯达起草的《工业 10 条》（草案）。谷牧同志在周总理支持下，会前做了认真准备。谷牧同志汇报时说：“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的具体作法，应该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到工交企业的特点。即：（一）工交系统基本上

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二）工交系统的干部和职工队伍基本上是好队伍；（三）工交生产的连续性决定了生产不能中断。这几点对文化教育系统，同各级党政机关不一样，文化大革命的作法应当有所不同。”谷牧同志不畏林彪、江青一伙的权势，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实事求是，坚决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仅反映了工交座谈会参加者的呼声，也表达了关心党和国家命运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志。但是在那是非颠倒的年代，真理败于谬论不足为奇。谷牧同志汇报后，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即以《汇报提纲》为靶子，展开围攻批判。12月6日，会议主持者林彪对工交座谈会及《汇报提纲》做了彻底否定的总结讲话。耐人寻味的是，林彪主持的这三天会议，周总理虽然参加，但会议进行中很少说话。直到林彪作了长篇批判性讲话后，他才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谈过程，说谷牧等同志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影响运动的进展。周总理的这些话实际上是为谷牧等同志开脱责任。周总理内心十分清楚，林彪的讲话，显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了毛主席的意图。在判明了形势发展趋势后，周总理便努力把这场斗争引向退却。他对陶铸、谷牧等同志语重心长地说：现在的形势是“工交欲罢不能”，“浪潮来了，要站在浪潮的头里，因势利导，顺势搞下去，就能领导，逆着浪头会被浪头冲掉”，“既然已经挡不住，不如疏导”。陶铸、谷牧等同志在这次会议上迫不得已地作了“检查”。会议在充满政治高压的气氛下，正式通过《工业10条》，并由毛主席批准发出。周总理在判明毛主席的态度之后，适时地将斗争引向退却，竭尽全力保护了一批经济战线上的高级领导干部，使他们免遭更大的迫害，能留下来和他一道支撑岌岌可危的经济局面。采取这种以退为进的斗争方法，为后来的事实证明是完全必要的。经毛主席批准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10条规定》提出：工矿企业可以成立派别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改变了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到全国工交财贸系统的基层单位。虽然列入了工人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和业余时间搞运动的内容，但在实际上也没得到遵守。不久就出现全国范围的混乱局面。工人参加派性斗争，使武斗升级，许多地方发生运输中断，生产停顿。从1967年5月份开始，工业生产和铁路运输陆续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周总理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精力抓生产。他每周都要挤出时间，常常是通宵达旦，听取铁路、交通、煤炭、电力等部门汇报情况，研究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措施。交通运输和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这些方面生产中断，整个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都要受到影响，因此周总理紧抓不放。但是在全面夺权以后，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业单位的领导已经瘫痪，利用原有的组织系统抓生产已经不能奏效。要扭转这种局面，根据当时情况只有实行军事管制。周总理在征得毛主席同意后，对铁路、交通、煤炭、电力其官关系国计民生和战备的重点企业逐步实行军管，组成以军队干部为核心的原有少数领导干部和造反派（或群众代表）参加的领导班子，并且在军管会之下分别建立抓运动和抓生产的组织。这样生产秩序虽然有所好转，但是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仍在发展，不可能恢复正常。

1966年12月15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同日，毛主席批准发出。该指示提出：社队可以建立红卫兵组织，社队之间可以串连，学生也可以到乡下去串连；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也要采取大鸣、大放、大字

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这一文件的下发，改变了中央关于农村原则上不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把动乱扩大到了农村。

196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动乱加剧，正常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被打乱，许多地方武斗频繁，运输阻塞，生产中断，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半无政府状态，工业生产普遍下降，财政出现赤字。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其中农业增长1.6%，工业下降13.8%。

至于农村，尽管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大批城市红卫兵下去鼓动“造反”，许多社队的领导权被夺，有些地方也发生武斗，但是广大农民懂得不种田没饭吃这个千真万确的真理，他们仍然照常进行生产劳动。因此，“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国的农业生产受到的破坏比较小，农业生产稳步发展，连续十年取得好收成。

六、关于所谓“二月逆流”

党政机关的领导权被造反派篡夺后，国家迅速陷入一片混乱。林彪、江青等人还想搞乱军队。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这种状况表示强烈不满。一批身居高位的老革命家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懑，同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抗争。这场抗争，实际上从1967年1月19日开始，到2月19日为止，就军队要不要稳定，“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该不该统统打倒等问题逐步展开的。

1967年1月19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提出：军队也要发动群众搞“四大”。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坚决反对。老帅们尖锐地指出：党政机关都已经搞乱了，不能再把军队搞乱。军队搞乱了，要天下大乱的！老帅们还当面责问陈伯达、康生、江青：“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把军队搞乱，还要不要这个支柱？”

1967年1月20日，林彪在京西宾馆召开中央军委常委会，提出：军队要全面搞“四大”。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四位副主席坚决不同意，并且责问林彪：“军队搞乱了，全国大乱了，你国防部长靠什么？”叶剑英同志用拳头敲着桌子说：“谁要搞乱军队，绝没有好下场！”徐向前同志也愤怒地站起来推倒茶几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掉吗？”

1967年1月28日凌晨，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讨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稿。会议决定，野战部队不搞“四大”，军队院校可以搞，但不准串连。1月28日，毛主席批准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命令》明确规定，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命令》还规定，今后一律不得冲击军事领导机关。

1967年1月31日，周总理接见军队院校、文艺等单位的代表，阐述和解释《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强调人民解放军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冲击和进驻军事领导机关，更不能随便揪人、抓人。

1967年2月10日，周总理主持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讨论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规定》指出：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分期分批进行“四大”；陆、海、空的军以下单位及北京卫戍区、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不搞“四大”，坚持正面教育，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到这些单位串连；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地夺权，不允许冲击；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要分清无产阶级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当权派，对当权派不能一概打倒；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倾向。会后，将《规定》送毛主席、林彪阅批。次日，毛主席批：送总理照发。

中央军委先后发出的《命令》和《规定》，有力地挫败了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要搞乱军队的反革命阴谋。

1967年2月11日，周总理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会上，叶剑英、徐向前等同志，对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乱党乱军的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

争。叶剑英同志质问陈伯达：“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徐向前同志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行吗？”

2月16日周总理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原定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等同志（以下简称三老四帅）拍案而起，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义正辞严地对中央文革小组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乱党乱军、打击迫害老干部的行为进行了激烈抨击。谭震林同志质问张春桥：“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谭震林同志要退出会场，周总理叫他回来。陈毅同志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当李先念同志说到：“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老干部通通打倒了”。周总理接过李先念同志的话，对陈伯达等说：《红旗》13期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

怀仁堂会议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与江青密谋，当晚整理“记录”向毛主席告状。告状时，张春桥提到，周总理对《红旗》杂志13期社论没有送他审查有意见。毛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中央常委会讨论。叫张春桥与周总理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中央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中央文革小组讨论。

2月19日凌晨，毛主席召开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他面带怒容，严厉地指责2月16日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作法表示强烈不满的谭震林、陈毅等同志。他说：“你们在怀仁堂会议上联合起来，搞突然袭击，向中央文革发难，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搞宫廷政变，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办不到！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林彪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到会的周总理心情十分沉重，他已经看出，毛主席发这么大的火，一定是听了江青一伙的诬告。他内心支持“三老四帅”的观点，又不能对毛主席“火上浇油”。毛主席已经明确支持林彪、江青，而“三老四帅”毫不退让。这样继续下去正中林彪、江青的下怀，不能走这步凶多吉少的险棋。保存实力，保护“三老四帅”过关的良策，就是要先顺从毛主席，检讨过关。于是他巧妙地出来打圆场，对毛主席说：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这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也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做了检讨。他们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查。毛主席采取了对周总理宽容的态度，但对“三老四帅”毫不让步，他依旧生气地说：“他们根本不认错嘛！恩来同志，我建议这事要认真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罢，起身退场。

会后，周总理立即与“三老四帅”商量对策及过关的办法，提出三条建

议：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岗位绝不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要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三老四帅”被他一片良苦用心深深感动，同意他的意见，主动要求找毛主席做检查。在得到毛主席谅解后，周总理又趁热打铁，拿出“五一”节联欢晚会让“三老四帅”出席的名单，毛主席十分爽快地签了“同意”二字。

周总理以他超群的斗争策略，巧妙地化解了矛盾，保护这批共和国元勋度过了险关，也打破了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借毛主席之手铲除“三老四帅”的阴谋，为后来粉碎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保留了骨干力量。

老一辈革命家的二月抗争被压下去之后，江青一伙将二月抗争污蔑为“二月逆流”，向社会上散布，煽动群众掀起所谓“反击自上而下复辟逆流”。由此出现更大规模的揪斗、打击、迫害党政领导干部，冲击党政领导机关的狂潮。

1971年11月，周总理、叶剑英同志等陪同毛主席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领导干部时，毛主席在批判林彪的谈话中提出：“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它的性质是老师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师”。1972年1月6日，周总理和叶剑英同志前往毛主席处商谈工作，谈完后，毛主席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叶剑英同志前往医院向重病中的陈毅同志作了传达。1972年1月6日，陈毅同志不幸逝世。1月10日，毛主席参加了追悼大会，他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而且表示，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人都搞掉。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行动，而不是例行公事。陈毅同志的丧事安排是毛主席审定的。他在审批时并没有讲要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毛主席穿着睡衣到八宝山礼堂。周总理在追悼会（下午三点）前不到一小时才知道毛主席要参加。显然，毛主席这一行动是经反复考虑后决定的。这既是为功勋卓著的老部下恢复名誉的一种表示，也是承认自己在所谓“二月逆流”问题上整错了“三老四帅”。

陈毅同志逝世后，我参加了治丧工作。原定的治丧规格比较低。周总理得知毛主席参加追悼会后，提前赶到八宝山公墓礼堂，见到我立即指示：主席要来，参加追悼会的负责人要增加，追悼会推迟半小时。周总理一口气说了二、三十个名字，大体上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我立即电话告诉国务院值班室马上通知。

陈老总是文武兼备的开国元勋，一身正气，刚直不阿，深得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敬仰。尽管江青一伙唆使造反派制造谣言，诽谤他、丑化他、打倒他，但是，陈老总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形象是打不倒、抹不掉的。陈老总的逝世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很大悲痛，人们怀念他，为他鸣不平，许多干部和群众想参加追悼会而没有机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建人同志因为没有得到参加追悼会的通知，给周总理写信表示不满。周总理批给我，要我给周老写一信，检讨几句，让他消消气。我遵照总理指示给周老写了一封信，承担责任，向他检讨和道歉。

在党和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三老四帅”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的会议上，对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的倒行逆施，提出批评，是符合党章的，是正常的。但是，由于党内生活不正常，“三老四帅”的正义抗争，不仅被压制下去，而且被江青一伙污蔑为“二月逆流”。这完全是是非颠倒。七位老革命家的凛然正气，一心为党为民的崇高品质，是十分可贵和令人敬佩的。当时，周总理在政治上与“三老四帅”是完全一致的。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更重要的是周总理认识到同毛主席对抗必将失败，因而采取保存力量，保持阵地，施加影响，减少损失的策略。如果他不采取这样的策略，而采取正面对抗的方针，无非是两种前途：一是他和“三老四帅”像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一样，都被打倒，把政权让给林彪、江青一伙；二是与毛主席分道扬镳，党、军队、国家分裂，将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历史证明，周总理的选择是正确的。

“二月抗争”遭到毛主席压制后，国务院除林彪、谢富治外，其它所有的副总理都被整得无法工作。这对处境已经很困难的周总理，真是雪上加霜。这时，周总理一面努力帮助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余秋里同志检讨过关，争取继续工作；一面经毛主席、中央政治局批准，组建国务院业务组，协助总理处理国务院日常工作。那时各地区、各部门关于政府被夺权、领导干部被扣押、交通运输中断，武斗、停工停产等报告像雪片一样飞来，各种各样的难题都堆到周总理那里，他日日夜夜为党、为国操劳。可是林彪、江青一伙还不断的搞阴谋诡计进行破坏，我们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也为周总理的命运担忧。

七、关于“九·一三事件”

党的“九大”之后，林彪集团掌握了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权力。林彪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写入了党章。但野心家林彪并不满足，他们阴谋利用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机会，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企图。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这些野心家根本不讲原则，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争夺各自宗派集团的权力。在“文化大革命”中取得显赫地位的陈伯达，这时与江青的矛盾日益尖锐，转而投入林彪集团。在审定宪法修改草案时，这两个集团之间积累的矛盾开始表面化。在1970年8月13日的宪法工作小组会上和8月1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上，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中表述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句子中加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而廉生、张春桥则发言反对。他们之间为此发生激烈争论。从表面上看，这只是文字之争，实际上是借题发挥。是一场大的斗争的前奏。

1970年3月，中央开始筹备四届人大会议和讨论修改宪法。4月，林彪不顾毛主席多次说过的不设国家主席，他也不担任国家主席的主张，再次建议宪法要规定设国家主席和请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毛主席认为林彪此议“不妥”，但林彪并未善罢甘休。表面上林彪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实际上，叶群1970年7月在私下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和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林彪在开幕会上，突然发表长篇讲话，仍然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他大讲“天才”问题，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随后，林彪的党羽立即倾巢而出。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小组发言，他们吹捧林彪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并且强烈要求宪法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副主席。并且在各小组宣讲陈伯达选编的《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他们还在发言中不指名地煽动有人“否认毛主席是天才”、“贬低毛泽东思想”、“不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陈伯达指使华北组抢先发出第二号简报。参加会议的绝大部分同志不明真相，表示愤慨，要求把这种人“揪出来”，在党中央全会上制造了一场罕见的大混乱。毛主席及时识破了林彪的阴谋，决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并责令陈伯达检讨。周总理也连续找吴、李、邱谈话，责令他们向党中央做检查。8月31日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的文章，严厉批评了陈伯达，揭穿了称“天才”的骗局。当时对林彪还是采取了保护态度，没点他的名，但揭发批判陈伯达这件事本身，就沉重打击了林彪集团，宣告他们利用和平方式抢班夺权的阴谋失败。

庐山会议的较量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失败告终。但林彪并不甘心失败。他在庐山对吴法宪说：“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他们转向以暴力方式抢班夺权，积极策划反革命政变。

1971年2月，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苏州的一所别墅，开始秘密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3月初，林彪授意林立果搞一个武装暴乱计划。他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当时，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他利用职权

和特殊身份很快在空军里纠集了一群死党，组成反革命别动队，代号为“联合舰队”。经过一阵密谋，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代号为《五七一工程纪要》。

《纪要》提出“军事上先发制人”，“夺取全国政权”，或者制造“割据局面”。强调“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把毛主席杀害。

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主席让周总理主持召开华北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中央还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1971年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并责令林彪集团的黄、吴、叶、李、邱在会上作检讨。党中央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削弱了林彪集团的权势，打乱了他们的阵脚，使他们限于被动境地。

8月14日毛主席乘坐专列从北京出发，开始了对南方的巡视。途中与一些省、市、大军区的负责人谈了话。对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的活动，做了更尖锐的批评。毛主席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并明确指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做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毛主席还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

9月5日，李作鹏陪外宾到武汉，从武汉空军政委刘丰那里得知了毛主席讲话内容后十分紧张，他火速赶回北京，告诉了黄永胜，并报告了在北戴河的叶群。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得知毛主席的讲话后十分恐慌，他们在北戴河连夜进行紧张的密谋后，悍然决定对南巡途中的毛主席下毒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9月7日林立果对他的特务武装“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8日林彪下达了反革命政变的手令。他们准备在上海附近的一个小火车站动手，炸毁毛主席乘坐的火车。

南巡途中的毛主席根据各方面的反映和一些反常迹象，对林彪的阴谋活动有所察觉，改变了行动规律。9月10日，专列抵达上海，未按惯例长住，昼夜兼程，回到北京。使林彪一伙苦心策划的阴谋化为泡影。林彪、叶群眼看杀害毛主席的阴谋破产，决定带着黄、吴、李、邱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形成武装割据，以图日后东山再起。

9月12日晚10点30分，周总理接到中央警卫局的报告，得知林彪驻地活动异常，并调动一架三叉戟飞机时，当即给吴法宪、李作鹏打电话查询有关情况。林彪、叶群得知周总理查询飞机的事，顿时乱了方寸，为了掩盖南逃阴谋，叶群故意于当晚11点20分打电话给周总理说：“林副主席想动一动”。周总理问：“是空中动，还是地上动？”叶群答：“空中动”。周总理又问：“你那里是否有飞机？”叶群撒谎说：“还没有调飞机来”。当时，周总理已经知道林彪的256号专机已调到山海关机场，他从叶群的撒谎电话判明林彪心怀鬼胎，可能要跑。周总理立即给李作鹏打电话：“停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有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四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但是，李作鹏给山海关机场下达的命令却将周总理的指示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

由于周总理高度警惕，并且采取了紧急措施，使林彪意识到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已经不可能实现，于是改南逃为北叛，立即乘飞机前往苏联伊尔库茨克，投苏叛国。

9月13日零时左右，林彪一伙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乘车逃往山海关机场，并开枪打伤了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零时32分，林彪乘坐的飞机从山海关强行起飞。此时周总理已得到毛主席批准，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当飞机进

入内蒙上空，吴法宪电话请示是否拦截林彪的座机？周总理答：“此事须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去吧。”飞机越出国境，进入蒙古，从雷达的荧屏上消失的时候，已是凌晨1时50分。当时周总理尚未掌握林彪一伙的全部阴谋活动，为了毛主席的安全，以防万一，接毛主席到人民大会堂暂住。随后，周总理召集政治局委员紧急会议，通报了主席回京和林彪叛逃的情况，并做了紧急战略和保卫北京、保卫中央的部署。

周总理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值班人员多次劝他休息一下，他始终不肯。9月13日一整天，周总理亲自给各大军区和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外逃情况，布置任务，要求各地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并对各部门应付意外情况，做出部署。一直忙到9月14日上午，连续工作两个昼夜，在大家的劝阻下，他才躺了下来。下午两点，周总理又被秘书叫起来接电话，当他听到林彪所乘的飞机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附近坠落，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时，高兴地连声说：“摔死了，摔死了。”并立即向毛主席报告了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

从已经掌握的情况看，黄、吴、李、邱与林、叶关系非同一般。对此，毛主席告诉周总理：“看他们十天，教他们但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9月23日，毛主席过问此事，周总理汇报说：黄永胜等人正在拼命烧材料。毛主席、周总理决定，立即处理黄永胜等人。9月24日周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对黄、吴、李、邱实行隔离反省。随即召集军队高层领导人开会，传达中央的决定。同时宣布中央军委工作由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筹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实行集体领导。

在处理林彪叛逃过程中，周总理处于整个指挥的中心。他明察秋毫，当机立断，及时做出周密布置，挫败了林彪集团南逃另立中央的图谋，避免了内战的危险，并以最微小的代价，彻底斩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在“九·一三事件”中，周总理为国家和人民立了大功。他本人也更加受到毛主席的信任，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戴。

周总理同林彪集团的斗争并非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始。周总理很早就赞成林彪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指示。1966年7月26日周总理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林彪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是“最高指示”、“最高最活”等类言辞，我同毛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认为“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对林彪宣扬“突出政治，一通百通”、“有精神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质成果”等政治决定一切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表示反对。周总理强调“政治要与业务相结合，政治挂帅要落实到业务上”，“反对空头政治”。

周总理对林彪把党的领导视为“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对林彪取消“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由院校党委领导的决定”，表示反对。周总理强调，不能把党的领导同大民主对立起来。反对“踢开党委闹革命”。对于林彪借“文化大革命”不择手段地整老同志表示反对。如林彪打击迫害贺龙同志，周总理用保护的方式进行抵制。对于林彪在1969年底—1970年初战备期间的瞎指挥，周总理也进行了抵制。如林彪曾下令放掉密云、官厅两个水库的水，周总理知道后，在一次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上，对列席会议的黄永胜说：密云、官厅水库的水不能放，现在情况没有那么紧急，把水库的水放掉，北京几百

万人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怎么办？要黄永胜立即报告林彪。

“九·一三事件”以后，毛主席对周总理更加信任和倚重。毛主席决定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1973年8月党的“十大”上，周恩来重新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本来周总理是党的“八大”选出的中央副主席，1966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几位党中央副主席不再提及，只有林彪被称为副主席。党的“九大”后，林彪便成为唯一的副主席，周恩来只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从周总理党内职务的变化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没有把周恩来视为可以信赖的助手，他信任和依靠的是林彪等人。“九·一·三事件”，使人们清楚地看到，鼓吹个人崇拜最厉害的林彪，竟然阴谋杀害毛主席；由党章法定的接班人竟然叛国出逃；新提升的六名政治局委员竟然一同从事反革命活动，等等。

所有这些不能不促使人们进行严肃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必要的？它所造成的灾难究竟有什么价值？继续下去有什么意义？它促使人们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毛主席也由此产生极大的痛苦和失望，不得不对自己的错误政策作局部调整。但是，毛主席依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依然信任和支持江青集团。因此，周总理同毛主席的分歧和矛盾依然存在，周总理的工作依然困难重重。

我记得，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李先念同志讲过这样一件事：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总理问我：“你看中央的问题解决了吗？”我说：“没有解决，中央文革一伙还在嘛！”总理说：“问题远没有解决，难啊！”说着说着，总理眼眶里充满了忧国忧民的热泪。

八、打开中英、中日外交关系， 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

6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新中国建立后，美国对我国采取敌视政策长达二十余年，他们不仅在外交上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阻挠我国解放台湾，而且对我国实行孤立和封锁，妄图把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然而，新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中国不但没有被扼杀，相反的成为世界上一个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中苏关系由友好盟国变为敌对状态。美国为了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根据自己的战略需要，不得不改善同中国的关系。1969年2月1日，尼克松入主白宫，这位明智的总统下决心同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毛主席、周总理审时度势，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对我国外交作出富有远见和胆略的重大决策。其核心内容是利用美苏矛盾，改善中美关系，对付苏联的军事威胁，打破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孤立和封锁。为了贯彻实施这个战略决策，周总理一方面要用更多的精力抓外交工作，特别是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工作；另一方面要排除林彪、江青集团的干扰破坏。同时，还要说服教育受极左思潮影响的干部和群众。周总理为此日以继夜地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

1971年5月26日，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中美关系问题。会后，周总理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关系的报告》。《报告》回顾了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美关系演变的过程，估计了同基辛格的预备会谈和尼克松的访问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拟出相应的对策，提出中美会谈的八点方针，主要是：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容干预；中国人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活动；美国如欲同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报告》还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对中美会谈存有疑虑的问题。

6月4日—18日，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传达讨论中美关系及有关国际问题。6月4日，周总理宣讲《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在谈到批判对外工作中的极左思潮问题时说：一直到现在我们总说批判极左思潮不彻底，不敢大胆批评，包括我们中央许多部门，一直到现在还有。你不把极左思潮肃清，怎么能掌握正确的政策呢？在谈到对外宣传工作时，强调：毛主席的方针就是不要强加于人，不要以我为核心，自以为左，藐视一切，瞧不起人家。6月18日，周总理出席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就国际形势、中美关系、以及国内工作等问题讲话，提出：在当前形势下，要动员全党了解和体会毛主席的外交路线和政策，同时，还要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坏人利用的极左思潮，特别是对外政策方面的极左行动，像火烧英国代办处、主张出兵香港、随便提断交、冲砸外国大使馆、到外交部夺权，等等。这种“左”的言行要批判，但也要防止右的。

1972年2月21日—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来华访问。尼克松总统于2月21日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两位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周恩来总理与尼克松总统就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2月27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就《联合公报》达成协议，并予发表。这个《联合公报》是在尼克松

访华之前和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就两国关系问题，经过反复磋商，达成的协议。1971年10月20日，基辛格再度访问北京，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周总理与基辛格举行会谈。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基辛格表示美国不会背弃“老朋友”，不会与台湾断交。周总理立即严正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我们这三项立场是不变的。1972年1月6日，周总理接见为尼克松访华进行技术安排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时，就台湾问题重申中国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是有着非常强烈的情感的。如果美方真有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就应当对中美关系的这个关键问题采取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来华后，周总理与尼克松会谈时，在尼克松重申美方对处理台湾问题的原则后，周总理指出：还是那句话，不愿丢掉“老朋友”，其实，“老朋友”已经丢了一大堆了。老朋友有好的有不好的，应该有选择嘛。你们希望和平解放台湾，我们只能说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因为这是我们同蒋介石两方面的事。经过多次磋商，在达成协议的中美《联合公报》中说：“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在尼克松访华前的1月4日，周总理接见黑格一行。黑格带来的美方公报草稿中，有“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Viability）”这样的字句。在1月6日晚上的会谈中，周总理严肃地指出：“黑格先生，你们为什么要在公报中使用‘生存能力’（Viability）这样的字眼呢？”黑格作了解释。周总理指出：“美方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并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令人惊讶。中国认为，任何国家绝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和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一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主权国家的生存能力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于到处充当保护人。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映，我们不能接受。黑格自知理亏，抱歉地说：“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个同包含有这个意思，很抱歉，总理先生，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删掉。”

在黑格来北京期间，周总理指示熊向晖同志与黑格的助手齐格勒洽谈：请美方帮助租用一个通讯卫星。齐格勒估计租金可能需要100万美元。他建

议中国不必花钱租用，只要在尼克松总统所到的北京、上海、杭州安置地面站，费用由美国承担。熊向晖同志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说：“不要一听100万美元就想缩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而是涉及我国主权问题，不能有丝毫含糊。”周总理要熊向晖同志告诉齐格勒：“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一颗通讯卫星，租用期是北京时间1972年2月21日上午1时至2月28日24时；第二，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必须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将予以同意，中国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不做冤大头。”齐格勒听后很惊讶地说：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同意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租费一定很合理。可以设想，租费和使用费这两项费用之间会划个‘=’（等号）。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更佩服你们处处维护国家的尊严。齐格勒还表示很赞成基辛格的想法：周恩来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衷心敬佩的伟大政治家和外交家。

周总理在同尼克松会谈中，既坚持原则，又适当灵活，促成了中美会谈的成功，达到了改善两国关系的目的。中美会谈的每一步，周总理都要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并得到毛主席的批准。中美会谈的方针等重大问题都要提中央政治局讨论。在尼克松访华前，召开中央工作会谈，传达讨论中美关系问题。会后，各地区、各部门传达了会议精神。由于中美会谈的方针是毛主席批准的，周总理又作了如此周密细致的安排，使时刻准备挑毛病进行干扰破坏的林彪、江青集团找不到借口，无计可施。江青曾提出：“欢迎尼克松来访，奏美国歌曲《美丽的阿美利加》，是为美帝国主义唱赞歌。”还说：“不能在中国土地上向美国和全世界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遭到周总理的批驳。周总理说：“《美国的阿美利加》，我记得这是一首赞美美国风光的曲子嘛，不要太‘左’了。”对于电视播放，周总理十分气愤地说：“岂有此理！过去美国政府一直敌视中国，现在美国总统要来中国访问，这是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亿万人民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情况，就会引起思考，增加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这是为尼克松宣传？还是为新中国宣传？”

中美关系的缓和直接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改善。日本政府曾长期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尼克松访华后，在日本朝野引起很大反响，日本舆论强烈要求尽快争取中日建交。1972年7月7日，日本佐藤内阁下台，田中角荣就任内阁总理大臣。田中首相就任以后，毅然提出新的对华政策，声明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表示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即：一、中国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阴谋；二、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坚决反对“台湾归属未定”的论调；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并且为此采取了实际步骤。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立场，作出了积极的响应。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了良好基础。

1972年9月25日—30日，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问了中国。毛泽东主席于9月27日会见了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周总理与田中首相就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会谈。由于事先经过频繁协商，观点比较接近，两国领导人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建交谈判总的来看比较顺利。但是，也曾出现若干重要分歧。9月25日晚，周总理举行欢迎宴会。在

周总理致祝酒辞后，田中首相致答辞，在谈到日本侵华战争时，轻描淡写他说：“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我再次表示深刻地反省。”周总理和在场的中方人员听了田中的这番话都十分反感。

26日上午，姬鹏飞外长和大平正芳外相商谈中日联合声明稿。日本条约局局长高岛首先发言，他提出：第一，不同意我方提出的方案中“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宣告结束”这句话，认为这样写“日华条约”一开始就是无效的；第二，对我方提出的复交三原则，认为应分开写，其中第三条“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予以废除”，不同意写入联合声明；第三，关于台湾问题，认为根据；旧金山条约日本已放弃了对台湾的一切权利，现在已无必要对此再作出法律上的认定；第四，关于战争赔偿问题，他说，我们对于中国方面主动提出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给予高度评价和感谢。但是，他认为蒋介石早在“日华条约”中放弃了赔偿要求，没有必要再写了。高岛发言的中心是台湾问题，他拘泥于法律条文，给中日谈判蒙上了阴影。所谓“日华条约”，即1952年日本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的“和约”。国民党政权，已于1949年被中国人民推翻，它无权代表中国，该“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我国从不承认。

26日下午，周总理与田中首相举行第二次会谈。周总理严肃他说：在昨天的晚宴上，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刻地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说“添了很大的麻烦”这句话，好像是在街上弄湿了过路女人的裙子，说一声道歉似的。周总理列举侵华日军大量罪行后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用“添了很大的麻烦”来表达，在中国人民中间是通不过的，而且会引起强烈反感。田中在解释日本立场后表示：“如果你们有更适当的词汇，可以按中方的习惯改。”关于恢复中日邦交问题，周总理说：我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可以照顾双方。如果从法律条文上去解释，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中日要建交，如同大平外相所说，就要同蒋介石断交，“日台条约”就自然失效。如果把“旧金山和约”，日台条约都拿出来作根据，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我们说，只有在你们充分理解我们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基础上，才能照顾你们面临的一些困难，而不是相反。“日台条约”在联合声明中可以不提，但不能让我们承认这个条约的存在和合法。不然就等于中国是从今天才算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这是我们根本不能接受的。关于战争赔偿问题，周总理说：高岛先生的说法，使我感到惊讶和愤慨。蒋介石政权早已被中国人民推翻，他不能代表中国，他与日本签订的所谓“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遭受战争损失主要在大陆上，蒋介石宣布不要战争赔偿，是慷他人之慨。我们是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出发，为的是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才宣布放弃索取战争赔偿要求的。这也是毛泽东主席的主张。对此，高岛先生不仅不领情，还提出中日联合声明中不必再提战争赔偿问题，因“日台条约”已宣布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这种说法是对我们的侮辱，我听了以后，简直不能容忍！

9月28日，周总理与田中首相举行第四次会谈。周总理说：明天发表中日建交联合声明以后，大平外相根据田中首相的指示，准备对记者发表一个讲话，声明日本政府将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这证明你

们这次来是守信义的，这是我们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良好开端。又说，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中国有句古语说：“言必信，行必果”。你们这次来表现了这种精神。周总理当场用毛笔写了“言必信，行必果”六个字送给田中。田中也将日本旧宪法上的一句话“信为万事之本”写成汉字赠给周总理。多年之后，田中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不拘泥于一件事情，而是抓住大局，高瞻远瞩，推进谈判，仅此一点就不能不使我感动，周恩来这个人下愧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9月29日上午10时，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字。《联合声明》说：两国人民切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声明说：

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国和日本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中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中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中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谈判和以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谈判。

随后，日本同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

中日谈判的过程，周总理事事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并得到毛主席的支持。为了使全国人民理解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意义，外交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起草了《关于接待田中角荣首相访华宣传提纲》，周总理亲自作了修改，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这个文件要求各大城市在田中首相访华前做到家喻户晓。文件还有针对性地回答了在人民群众中存在的疑问。这个文件对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使江青集团无隙可乘。

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意义重大。它有力地推动了西欧、北美、大洋洲许多西方国家与我国建交；第三世界国家同我建交的也迅速增加。它不仅有利于我国的安全，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而且彻底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孤立和封锁，为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以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外部条件。

九、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

“九·一三事件”，使毛主席受到极大震动。他没有想到自己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竟然要谋害他。这促使他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开始有了一些认识。他批评了一些极左行为，纠正了一些错案，解放和重新起用了一些领导干部。

毛主席决定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叶剑英同志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李先念同志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这就使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党内上层健康力量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对比，发生了重要变化。周恩来同志不再是孤军奋斗，而有了有力的支持者。但是，毛主席从总体上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导思想，他依然信任和重用江青反革命集团。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都是“左”倾错误路线的产物。这两个集团在本质上是一丘之貉，他们之间的矛盾在于谁来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当时，周总理只能在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批判和纠正林彪集团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周总理深知，“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各方面造成的严重破坏，不完全是林彪集团干的。江青集团推行极左路线所造成的破坏更加严重。其根子是毛主席的“左”倾错误。这是周总理不能公开讲的实际情况。不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党的正确政策就难以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给各个方面造成的创伤也无法医治。因此，周总理在领导批林整风时，全面地展开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并从这里入手，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一）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在“文化大革命”出现“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狂潮后，周总理就开始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他批评“建国17年来实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的说法，认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他批评“把老干部都看成走资派”和“文化大革命的对象”的观点，认为“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老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他批评“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行为，主张“坚持党的领导”；他反对“全面夺权”，同意“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其它权不能夺”。他反对“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的无政府主义；他主张“稳定人民解放军”，反对“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反对“冲击军事机关”；他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反对停产闹革命”，“反对破坏生产秩序”；他批评林彪的“顶峰”、“最高最活”论，认为这种提法“不科学”；他批评林彪的“空头政治”，认为“政治挂帅要挂在业务上”，“政治要与业务相结合”；他坚决反对“武斗”，反对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在“文化大革命”中挑动武斗是林彪、江青一伙。有些地方的造反派抢夺军队的枪支弹药，实际上是有人支一派、压一派，向支持的一派“发枪、送枪”。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省一派群众组织代表时，公然支持“文攻武卫”的口号，并煽动说：“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次日，“文攻武卫”的口号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形成全面内战，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1967年7月毛主席曾亲自批阅《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武装工人改造城市民兵的请示报告》。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据此对上海市民兵进行了所谓“改造”，将党领导下的民兵，改变为造反派控制的武装，名为“文

攻武卫”，成为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伙阴谋篡党夺权的工具。然而，死心塌地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活动的是极少数人。粉碎“四人帮”的历史证明，上海的广大民兵在看清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伙的真面目后，迅速离开了他们，听从党中央的指示。1967年12月18日，毛主席在接见以谢佩奇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谈到各地武斗情况时说：“要打就打，我主张打。他要打嘛，不是我要打。凡是打得厉害的地方，解决问题比较容易。北京就不痛不痒，太文明了。”以后，全国内战发展到难于收拾的地步，毛主席才改变了态度，主张制止武斗。

（二）在经济战线上批判极左思潮，整顿国民经济

“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泛滥，是非颠倒，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抓生产被指责为“唯生产力论”，抓业务被指责为“冲击政治”，抓企业管理被说成是“管卡压”，抓盈利被攻击为“利润挂帅”，把按劳分配攻击为“物质刺激”。林彪集团还宣扬“什么有计划按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等等。很显然，不批判极左思潮，就难以扭转国民经济的混乱局面。为此，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国务院采取一系列措施。

1970年10月5日，经周总理审阅同意，国务院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报告》针对当时农业战线存在的“左”的错误作出若干规定。例如，强调《人民公社六十条》中关于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仍然适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和自留地制度，一般不要变动。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不可“分光吃净”，也不要一下子积累过多，影响社员的当年收入。在服从国家统一计划的前提下，允许生产队因地制宜种植。不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其它物资，不得加重社员负担。中共中央于1970年12月11日批准了这个报告。这些政策和措施，对于稳定农村的生产关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

1971年3月30日，周总理主持会议讨论通过国务院向中共中央报送的《关于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的报告》。报告说，棉油粮生产形势很好，但仍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战略的需要。解决供需之间的矛盾既不能降低人民的消费水平，更不能靠进口，根本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努力增产粮食的同时，积极发展棉油糖生产。（1）合理安排油料、糖料集中产区的粮食征购和统销指标，坚决保证社员口粮不低于邻近产粮区的标准。（2）油料超购部分继续实行加价奖励的办法。留油标准由省、市、自治区自定，增产多、贡献大的，可以适当多留。（3）适当提高花生、油菜籽、芝麻、大豆等部分油料、油脂收购价格和糖料收购价格。（4）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与粮食分别计算，一年一熟的大豆集中产区，上《纲要》的指标，建议定为260斤。（5）丘陵山区，要大力发展木本油料。（6）社员自留棉换购，由一斤皮棉三尺布票，改为五尺布票。中共中央1971年4月11日批准这个报告，并发到全国公社、大队。1971年8月14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提高油料、糖料、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化肥、农药、煤油、柴油和一些农业机械等支援农业产品的价格。这些都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发展棉、油、糖生产。

1971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的建议，发出《关于继续实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通知》。自1965年开始，已经连续实行了粮食征购一定三年的政策。实践证明，实行这项政策，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因此决定从1971年起改为一定五年的政策。

1971年12月26日，党中央批准国务院代拟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存在的“分光吃净”，集体增产、个人不增收，超支户多，分配不兑现，以及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现象，要求解决好六个问题：（1）应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积累，但也不要一下子积累过多，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增加个人收入。（2）口粮分配要采取基本口粮和按工分分粮相结合的办法，或大多数社员拥护的其他办法，做到既有利于调动最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又要保证军烈属、职工家属和困难户能够吃到一定标准的口粮。（3）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学习大寨劳动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不要硬搬照套。（4）社队办集体福利事业，要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许任意增加脱产人员，宣传队、广播员、体育队必须在业余时间进行活动，“赤脚医生”要参加集体劳动。大队、生产队干部补贴工分不能超过《人民公社六十条》的规定。（5）切实解决超支户的问题，干部要带头偿还欠款。（6）注意农业的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

1972年5月23日，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少数民族商品生产和供应情况的报告》。国务院的批示说：我们党对少数民族历来是关怀的，对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供应一向是重视的。但是，近几年来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有些地方不考虑少数民族的特殊需要，任意取消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和供应，这种作法是错误的。要教育我们的干部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切实搞好对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和供应工作。

1971年12月16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会议，1972年2月12日结束。这次计划会议，在批判林彪集团的《“571工程”纪要》的同时，还批判了他们鼓吹的“空头政治”，提出批林要联系经济战线的实际，解决林彪一伙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问题。2月5日，周总理听取国家计委汇报会议情况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会议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和与会同志的要求，在国务院领导同志的主持下，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这个文件针对经济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了若干整顿措施，其中包括加强统一计划，做好综合平衡；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凡是应该解放而没有解放的干部，都要及时解放，大胆使用。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技术的关系，做到又红又专。忽视政治，埋头生产，空谈政治，不敢抓生产，都是不对的。把产品质量提到第一位。关键是肃清林彪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在企业管理上，明确规定要恢复和健全七项制度，即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安全生产制、经济核算制。明确要求企业要抓七项指标，即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指标。

这个会议《纪要》经周总理主持讨论定稿后，拟提请中央批转下发。张春桥借口“文件长了，不好发”给否定了。张春桥还公然反对批“空头政治”，

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就是批我们，对会议施加压力，把会议出现的批林热潮强行压制下去。尽管这个《纪要》因张春桥的阻挠中央未批转下去。但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国务院办公厅于1972年2月22日将此《纪要》（草稿）印发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国务院各部委，请他们按此向下传达，以后以中央正式批准的文件为准。

以后，国家计委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改写成《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1973年2月，周总理指示将这个《规定》拿到全国计划会议上讨论。这个文件针对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出以下十条规定：（1）坚持统一计划，搞好综合平衡，主要是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的平衡，反对各行其是；（2）不许乱上基本建设项目，不许随意扩大建设规模和增加建设内容；（3）职工总数、工资总额以及物价的控制权属中央，任何地区、部门和个人无权擅自增加和改变，企业事业单位的劳动力要服从中央和省、市、自治区的统一调度；（4）严格执行物资分配计划和订货合同，保证物资调得动，不准随意中断协作关系，申请物资不许弄虚作假、虚报冒领；（5）加强资金管理，严禁拖欠、挪用税款和利润，不准用银行贷款和企业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6）中央下放的大中型企业，由省、市、自治区或少数省属市管理，不能再层层下放；（7）整顿企业，按照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原则，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8）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计时工资加奖励的办法，少数重体力劳动可以实行计件工资；（9）加强纪律性，对于违反纪律的行为，要给予批评教育，违法乱纪的，要按照党纪国法给予处分和制裁；（10）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各级经济领导机构，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这个文件拿到1973年计划会议讨论时，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赞成，唯有上海反对。张春桥说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并要会议把文件收回。“十条”规定的起草，是对林彪、江青一伙煽起的破坏经济建设的极左思潮的尖锐斗争。

周总理在1972和1973连续两年想搞纠正经济领域极左错误的文件，均遭张春桥和中央文革一伙的反对。1972年计划会议讨论的那个《纪要》，主要内容是解决企业管理问题，在张春桥反对时，周总理所以暂时退让，可能是因为毛主席一度病危（1972年1月中旬），尚未康复的缘故。1973年计划会议讨论的“十条”规定，主要内容已经扩大为解决经济建设全局中的问题，这次遭到张春桥的反对后，周总理退让是由于毛主席在不久前（1972年12月17日）明确表示不赞成周总理批林彪的极左，而支持江青、张春桥批林彪的极右。

1970年以来，主要由于林彪集团不顾条件大上军工项目，致使积累率过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因而导致1971年我国经济工作出现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800亿斤。周总理首先发现了“三个突破”问题。他在1972年初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但是，到1973年初，“三个突破”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货币发行也突破了计划。当年市场平衡有30亿元的商品差额，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周总理指出，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但现在根本没有比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73年计划会议决定采取大力加强农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国防和行政开支、精简职工等措施。

1972年5月30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关于加强基本建设管理的几项意见》。这个文件针对基本建设中存在的战线长、浪费大、制度松弛、贪大求洋等问题提出如下意见：（1）基本建设要加强计划管理。所有的基本建设都要纳入计划，一律不准搞计划外工程；（2）用自筹资金安排的基本建设，其投资、材料和设备必须落实；（3）必须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全国基本建设计划，经中央批准后，不得擅自扩大建设规模和任意变更主要建设内容；（4）认真做好勘察设计工作。在对建设条件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几个方案，以便选择确定；（5）基本建设项目所需设备，实行成套供应；（6）加强施工管理，提高投资效果，尽快形成生产能力；（7）加强经济核算，努力降低工程造价。建设银行要严格按照国家计划、财政预算和工程进度拨款；（8）积极进行基本建设投资大包干的试点。

1971年12月15日，周总理对国产“歼6”飞机的质量作出批示：“‘歼6’40架，原说是为援外装配的，一经检查，有7架不能交付，占全数17.5%，只此一端，就可以看出我们的飞机生产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还不够我们提起警惕么！总理严令对该机“必须严格执行试飞和全检制度，合格方准出厂。”12月26日，周总理出席叶剑英同志召开的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在听取汇报后说：“为什么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恢复？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极左思潮。各单位一把手要亲自抓产品质量，要对党对人民负责，对祖国的荣誉和战士的安危负责。”1972年1月21日，周总理责成国家计委负责人把一汽、二汽和北京、南京汽车厂的产品质量抓一抓，并严肃指出：质量这样下降，如何援外，如何战备？此后，周总理又在四五月间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衣衫、照相机和其他日用工业品质量问题。他在接见参加广交会有关部门和单位的代表时，着重批判了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和产品质量带来的恶劣影响。指出：对质量问题，现在是主管机关不敢讲话，企业领导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这种状况必须改变，要把产品质量提到第一位。凡是质量低于历史最好水平的，要限期改进。凡是质量不合标准的产品，一律不准出厂。

在经济领域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尽管受到张春桥等人的阻挠。但是，周总理反对极左的指导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许多地方和企业加强了经济管理，使全国的经济建设出现了转机。1971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2.2%，其中农业增长3.1%，工业增长14.9%。197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5%，其中农业因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比上年下降0.2%，工业增长6.6%。1973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9.2%，其中农业增长8.4%，工业增长9.5%。

（三）在外交战线批判极左思潮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国的外事工作，也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破坏。江青、康生一伙为了打倒周总理和陈毅同志，他们肆意抹煞我国外交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诬蔑17年执行的是什么“三降一灭”的外交路线；他们策动造反派公开打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揪斗外交部的领导干部，打乱了外交部的工作秩序。周总理曾多次批评制止，造反派根本不听。他们对周总理开始是影射攻击，以后变成公开贴大字报攻击。周总理千方百计保护陈毅同志，他们同总理对着干。周总理说，外交大权属于

中央，不能夺。外交部造反派竟然于1967年8月18日夺了中央的外交大权。在国务院各部门的造反派中，外事口的造反派对周总理最敌视，气焰最嚣张。主要原因是背后有江青集团的支持，他们有恃无恐。被极左狂潮冲昏头脑的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高校的红卫兵，置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于不顾，悍然于1967年8月22日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给我国的国际声誉带来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后来，毛主席批准了周总理的报告，决定对王力、关锋隔离审查，才制止这股逆流。

此后，周总理要求外交部彻底肃清两个多月来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恶劣影响，并对操纵和指挥夺外交大权，“火烧英国代办处”等行动的坏人进行组织上的清查。于是，一度被打倒的老干部们重新恢复了工作，整个外交大权再次回到党中央、国务院手里。

在外交部的工作秩序恢复后，周总理进一步纠正对外关系和对外宣传工作中的极左错误。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与我国建交和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有近30个国家同我国发生外交纠纷，其中有些是由于我方处理不当引起的。也就是，有少数驻外使馆的干部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不尊重驻在国的主权，处理问题简单粗暴，在对外宣传工作上，不顾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主要任务，唯我独革，强加于人。这些极左现象，使我国的国际形象受到损害。毛主席、周总理曾多次批评，要求纠正。

对主要由于我方原因而损害的国家关系，周总理指示外交部和驻外使馆主动进行修复。例如，1967年被坏人烧毁的英国代办处，经周总理批准，我方为英方修建了新的住所，1971年春工程竣工，英国代办举行招待会，周总理指示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向英代办当面表示：1967年火烧代办处是一小撮坏人干的，中国党和政府都不赞成；现在，我们给你们修复了，你们迁入新居，让我们举杯庆贺。但是，当时这位同志却因招待会上有许多外国使节在场，没有开口说这番话。回来后受到总理的批评。周总理说：这些话你为什么不说？当着其他国家的大使说有什么要紧？而且还应该大声说！我们在外交关系上要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方是平等的。人家来到我国，我们用压的办法是不对的。英国在香港迫害我们的同胞，那是他不对，但不能因此而烧他的代办处。你搞他，他可以报复，那只能破坏外交关系，甚至断交。那是王、关、戚他们的路线。之后，周总理身体力行，亲自召见了英国代办，向他讲了上述意思，英国代办当场表示理解和感谢。

1971年6月初，新华社副社长石少华同志率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中社社长会见时谈了两国关系中的问题。石少华立即通过大使馆报告国内。周总理阅后批示：外交部电告石少华：“对朝中社社长谈话要表示诚挚的谢意”，对我方在极左思潮中和“5·16”反革命集团破坏朝中关系的错误，“要作出检讨”。石少华接到周总理指示时，已经离开平壤，到达新义州，不能再会见朝中社社长。石少华即在新义州朝方举行的欢迎会上宣布：过去在中朝边境诬蔑金日成主席的是极左思潮和坏人干的，不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已经把坏人抓起来了。石少华还对发生这种破坏中朝关系的问题表示道歉。

1972年4月7日，周总理接见旅游、援外工作会议代表，在讲话中传达了毛主席在对外关系方面纠正极左思潮的一系列指示。例如，毛主席对拟在援外物资上喷刷毛主席语录的请示报告批示：“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

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毛主席在中联部一个文件上批示：“以后不要在任何对外文件上、文章中提所谓毛泽东思想，作自我吹嘘，强加于人。”毛主席批评了在一个文件中，用了“世界革命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毛主席把一篇文章中的“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伟大典范。”这一段话都删掉了。等等。

1972年8月1日、2日，周总理向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部门的负责人作批判极左思潮的主题报告。在讲到国际形势和外事、宣传工作方针时，指出：“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的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驻外使领馆也有。如果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又说：“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有几年，他们利用‘二月逆流’那一点错误，说得了不起，要把老干部都打倒，把所有政治局的老同志都搞掉，都换成他的死党。”“他们打倒一切，破坏主席的威信和威望。”“（林彪）用极左的方法破坏主席的威信，把主席说过了头，什么‘顶峰’呀，‘一句顶一万句’呀，‘第三个里程碑’呀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假的，结果是要谋害主席。这样的人暴露出来是大好事。”强调指出：“极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谈，不实事求是，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关于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提出：“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运动和业务不能对立，如果真正懂得运动就要懂得政策，政策就是要落实在业务上。”“如果真正考察一个干部，说这个干部运动好，但业务不好，说明还没有落实。”在讲到解放干部的问题时，指出：“各部门应该把老干部解放出来。有些地方解放老干部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

1973年3月8日，周总理出席中联部、外交部举办的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招待会，向到会的各国专家及其家属讲话。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极左思潮泛滥，外国专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一些专家及其家属受到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待遇等情况逐个举例说明，并表示：“这个责任我们要负，作为政府的负责人，我负更多的责任”。还当场向在座的一些专家赔礼道歉。对于已经回国的专家，提出，如果他们愿意回来，中国政府将诚恳欢迎他们，以弥补当时我们未照顾好他们的过失。在谈到今后的外国专家工作时，说：遵照毛主席最近批评的不敢同外国人交往的错误倾向，有关部门要努力克服保守、排外的观念，增进与外国朋友的友好往来。周总理的这番讲话，使在场的各国专家深为感动，从而挽回了极左思潮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四）在教育、文化和科技战线批判 极左思潮，改变停滞状态

教育、文化战线是毛主席确定的“文化大革命”的重点，也是政治上的敏感区。周总理不能像对其它战线那样批判极左思潮，不然的话，就会同毛主席迎头相撞。尽管如此，周总理出于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仍然就某些极左

错误进行批评和纠正。科技战线的情况有所不同，周总理能够更坚决地纠正极左错误。

1971年7月6日，周总理接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针对会上关于建国后17年教育工作估计的争论，提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对17年教育战线的估计也有所松动。他曾经指出：17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路线的，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无视这些意见，仍然主张全盘否定。由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所谓“两个估计”：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完全错误的估计，长时期成为广大教师以至广大知识分子的沉重的精神枷锁。

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和夫人，就国内教育和科研问题发表谈话。关于教育，他说：“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当然这总是少数，大多数人要参加劳动，不一定升学”。关于科研问题，要求在座的国内科学家（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朱光亚、华罗庚等）应注重研究人才的培养、提高。周总理向李政道建议：准备派遣一批研究生去美国学习、深造。周总理的这些想法，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在当时要这样作，同“左”的“教育革命”方针是不相容的。要派研究生去美国深造，更是大逆不道。

1972年4月9日，周总理在广州观看部队文艺演出时，对提高艺术质量问题发表意见，要求肃清文艺工作中的极左思潮。周总理还在其它场合提出：“现在要提倡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齐放”。

1973年1月1日，周总理与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电影、戏剧、音乐等文艺工作者代表，对电影工作发表意见。他说：“群众提意见，说电影太少，接到很多群众来信。这是对的。不仅电影，出版也是这样”。“这是我们的巨大缺陷”。“总结七年来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薄弱的，文化组要把电影工作大抓一下”。江青针对周总理讲话说：“不是七年，是二十几年电影的成绩很少，放毒很多”。张春桥也说：在讲电影少的人当中，“不排除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江青、张春桥这种拒绝批评的态度，表明他们根穷不关心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煽起的“否定一切”的极左思潮，在出版方面造成严重恶果。建国后17年出版工作的巨大成就，被全盘否走，领导干部遭到残酷迫害。到1971年，全国的出版工作，除了出版毛泽东同志著作、中小学课本外，其它图书基本陷入停顿状态。许多知识分子为了避免遭到批判，不敢写作，出版社不敢出书。书店里只卖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其它的图书被视为“封资修”，不敢出售。大多数图书馆也封闭起来。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要求读书，既买不到又借不到，以致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当时，在中央分管宣传和文教工作的张春桥、姚文元，对人民群众的呼声，置若罔闻，漠不关心。在这种情况下，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的周总理于

1970年9月17日召集国务院文化组、科教组和出版部门的负责人，针对群众反映“中小学生没有字典用”、“青年人没有书看”等问题，对出版工作提出批评。他说：王云五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一个人有问题，书就不能用了？它总有可取之处嘛！要懂得水有源树有根。《新华字典》也是从《康熙字典》发展来的嘛！编字典可以有创造，但创造也要有基础。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新的出不了，旧的又不能用，怎么办？芭蕾舞是洋的，能说是我们创造的吗？我们编的芭蕾舞剧，基础是原来的，内容却是新的，形式又有了改变。这就叫做洋为中用。周总理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是法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三个来源还不是资产阶级的或受唯心史观限制的学说吗？可是它们都含有合理的因素。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根的，新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毛泽东思想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根。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要有点辩证法，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那叫形而上学、片面性。周总理强调，要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多出书、出好书，解决青年一代着急没有书看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指定科教组负责组织力量，对《新华字典》进行修订，争取早日出版发行。但是，整个出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仍然无人来抓。因为主管出版方针、政策的中宣部和主管出版行政管理事务的文化部已被“砸烂”，文化组、科教组都不管出版工作。江青集团日夜想的是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只顾破坏，根本不负责。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极左思潮泛滥成灾。如果江青集团来抓出版工作，不仅不能解决面临的问题，而且会把事情搞得更糟。因此，周总理也不会请他们出面解决。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只好亲自来抓。

1971年3月初，周总理决定3月15日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并指定我具体主持这个会议。对出版工作我是门外汉，承担这个任务困难很大。可是，我想到当时的困难情况，勉为其难，接受了这一任务。我们组织了一个会议领导小组，有一部分富有经验的老出版工作者参加，自己不懂的事情，虚心向大家学习，特别是向有经验的同志请教，并及时向总理反映情况，重要事项都向总理请示。周总理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曾先后两次接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听取会议情况的汇报，审阅会议起草的国务院向党中央的报告。4月12日，第一次接见，从凌晨1点开始，5点20分结束。周总理在听取汇报时，详细询问了许多情况，对极左思潮进行了批判，并对如何纠正极左错误作了具体指示。会议于7月22日结束。7月29日，周总理在接见其他会议代表时，一起接见了出版会议的代表。

在二次接见中，周总理针对林彪、江青集团对出版工作的干扰破坏，深刻地批判了他们鼓吹的形而上学，割断历史，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周总理指出：你们管出版的要印一些历史书。我们要讲历史，没有一点历史知识不行。现在书店里中国和外国历史书都没有，地理书也没有。不出历史、地理书籍是个大缺点。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有的地方把封存的图书都烧了，我看烧的结果就是后悔。应当选择一些旧的书籍给青年批判地读，使他们知道历史是怎么发展来的。否走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把《鲁迅全集》和《红楼梦》、《水浒》等古典名著封起来干什么？这不是滑稽得

很吗！把有点问题的书都封起来，只有少数人能看，只相信自己不会受影响，其他人就都会受影响？群众总是比我们个人知道得多，他们是能够做出判断的。一面说青年人没有书读，一面又不给他们书读，这是不相信青年人能判断，这完全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我看现在要出一批书，要广开言路。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是主要的，但也要读历史、地理、哲学等。有些青年连世界地理位置、重大历史事件都搞不清楚，知识面越来越狭窄，这不行，这样是不可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党的出版工作，必须坚持把出版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同时应该做好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参考读物，青少年读物，文学艺术读物，科学技术读物，经济、历史、地理、国际知识读物和工具书等各类图书，以及少数民族文字的图书出版工作。

周总理十分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对出版他们需要的文学艺术作品和工具书、科普读物等，都作了详细的指示。周总理还指示，要研究制定一个出版计划，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写作，有些旧书可以重印，图书馆应该清理开放。在谈到出版队伍的建设时，周总理明确提出，要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

周总理还很关心毛主席批准的二十四史的校点出版工作，指示从全国调一批专家从事这项工作，并请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负责总其成。在出版会议期间，我曾前往拜访顾颉刚先生，向顾老传达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顾先生表示，十分感谢周总理的信任和重托，一定要竭尽全力完成这一任务。

周总理在批判极左思潮时，不点名地批判了陈伯达的假革命、野心家、两面派的真面目（当时，陈伯达的问题还没有公开）；批评了破“四旧”时，不分青红皂白，违反政策，破坏文物的错误；还批评了中南海有些人胡造反，将紫光阁后院的乾隆谕旨碑和紫光阁前面的石狮子，以及清朝摄政王府（今第四会议室）门前的石狮子搞走的错误行为。周总理说：乾隆谕旨碑上有一句话“下马必亡”。这是乾隆教育他的后代，不要贪图享乐，不要忘记战备。我们共产党人也要警惕和防止产生这类问题。周总理责成我查找石碑和石狮子的下落。在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帮助下，费了很大的劲，终于把石碑、石狮子找回来，并请人将损坏的地方修补后，放置原位。我看过那座石碑，由于年久风化，碑文中有些字迹已经不清楚，没有看到“下马必亡”几个字。但碑上刻有“凡为君者，耽于酒色，未有不亡者也。……悉尊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等语，也就是“下马必亡”的意思。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一直称那座碑为“下马必亡”碑。

会议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起草了国务院给党中央的《关于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并草拟了一个出版计划。《报告》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中央有关部门党的核心小组，把出版工作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一年抓几次。目前，第一书记应抓一下出版工作。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后下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各部门贯彻执行。这个《报告》，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说了一些违心的话，但总的精神是批判和纠正极左思潮的。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国务院《报告》下达后，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抓出版工作的胆子大了，积极性高了，加上广大出版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买书、看书难的问题较快地得到解决。以后，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出版事业管理局，加强对出版工作的领导和管理。

那个时候，斗争极为复杂，有人利用出版为林彪篡党夺权造舆论。例如有一个省编了一本画册，名为《井冈山的斗争》，第一张画是林彪带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要求列入出版计划，在全国发行。我报告了周总理，总理指示：“这是歪曲历史，压下来，不答复”。还有一个高级干部，写了一本书，大肆吹捧林彪，也要求列入计划，在全国发行。并且几次打电话、发电报催办。我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压了一段时间，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自我爆炸，此事不了了之。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的科研，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加大了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周总理对这种情况早有批评。1972年7月2日，周总理会见杨振宁博士，对他提出的中国应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交流的建议，表示赞同。7月14日，对北京大学周培源教授说：“你回去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7月20日，周培源教授给周总理写信，反映老教师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意搞也怕搞基础理论研究，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并提出改变国内基础科学长期落后的建议。7月23日，周总理将周培源教授的信批给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要他们好好议一下，并认真实施。

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周培源教授根据周总理多次指示精神写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可偏废；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文章发表后，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随即指使人撰写批驳文章，对周培源教授的文章进行围攻。

8月10日，根据周总理的提议，全国科学技术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就加强科研工作、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但张春桥却说：“会议的大方向有问题”，“是右倾回潮”，并要求在会议《纪要》中写入“黑线专政”。周总理同张春桥进行了斗争，坚持不让在会议《纪要》中写上“黑线专政”，以保护科技战线的广大干部和科学工作者。会议最后形成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纪要》，经国务院批准后下发。

9月11日，周总理同意张文裕、朱光亚等18名科学工作者反映国内高能物理研究工作落后，要求改变现状的来信。复信时说：看了来信很高兴，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将理论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之后，周总理同二机部、中国科学院负责人研究确定：组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进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以加强高能物理的研究工作，尽快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五）批判极左思潮出现反弹

1972年10月14日，根据周总理8月初以来多次强调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一组批判极左路线和无政府主义文章，即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等三篇文章。对此，江青等极为不满。姚文元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要批到群众头上，

不要混淆两类矛盾”。江青说：这版文章“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江青等还一再追查文章的“背景”，组织批判会和反驳文章。

11月30日，周总理审阅并修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阅后批：“拟同意”，送毛主席及在京政治局委员传阅。次日，张春桥阅后对报告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提出异议，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12月2日，江青也批道：“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同日，周总理批示将此件送中联部、外交部有关领导传阅，并准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

12月2日，周恩来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次日，根据政治局讨论意见，外交部对原报告作了修改，删去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内容。但所列会议文件中，仍强调“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和“总理今年8月1日、2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讲话（纪要）”。4日，周总理审阅同意修改后的报告，并注明这是“经政治局讨论后，加以修改的”。毛主席圈阅了此报告。

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王若水写信给毛主席，反映一段时间以来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中，周总理与张春桥、姚文元之间存在不同看法，并表示同意周总理关于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6日，毛主席约见江青，要她将王若水的信转给周总理、张春桥、姚文元等，提出由他们一起找王若水谈话，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当日，江青将王若水的来信送周总理等阅。关于找王若水谈话事，江青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当日，周总理阅批：“同意我们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

12月15日、16日，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王若水12月5日信和对批极左问题的认识。

12月17日，周总理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到毛主席处开会。毛主席提出：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主席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12月19日，周总理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约《人民日报》社鲁瑛、吴冷西、崔金耀、王若水谈话，传达毛主席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的指示。江青在讲话中称，王若水12月5日信“客观上对中央起挑拨作用”，并提出要批一篇文章（指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文，批一个版面（指10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龙岩等文章的第2版），批一个部门（指《人民日报》社理论部）。周总理在讲话中提出：“我们内部极左思潮要批透”，但“不是讲林彪整个路线”。并表示：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工作的同志。

1970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搞阴谋活动失败后，他野心不死，妄图通过反革命政变、谋害毛主席，达到夺权的目的。在阴谋败露后，乘飞机叛国外逃。这是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林彪的这些图谋和行为，罪大恶极，当然是极右。但是，这是短期内出现的反革命行动，它不能概括林彪多年来所推行的路线。林彪以鼓吹“突出政治”，大搞个人崇拜，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和重用；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支持毛主席的“左”倾错误，并把它推向极端，大肆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造成极左思潮和

无政府主义泛滥，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后果。要纠正极左错误，落实党的各项正确政策，必须彻底批判和肃清林彪的极左流毒。毛主席支持江青集团批林彪的极右，反对周总理批林彪的极左，是缺乏说服力的。

批林彪应当批极左、还是批极右之争的实质，在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都是“左”倾错误路线之下应运而生的产物，批林彪的极左，必然牵连到江青集团，必然涉及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展下去，将会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不仅江青集团会疯狂反对，毛主席也是不能允许的。

毛主席既然反对批林彪的极左，主张批林彪的极右，周总理只好暂停。但是，正义和责任使周总理不可能真心诚意地支持错误的东西，他仍然在实际工作中反对极左，只不过把音量放低而已。

十、要不要发展对外贸易、 引进外国先进技术

中美两国关系缓和，中日建交，中国与许多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建交，彻底打破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孤立和封锁。这是我国外交战线上取得的伟大胜利。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为了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周总理及时提出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开展国际经济和科技交流的政策。

（一）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1972年4月9日，周总理在广州接见参加广交会的各地区、各部门的代表时说：“我们是以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但是能够出口的还要争取多出口”。“我们现在出口数量不大，质量这么差，怎么向国家交代？怎么向人民交代？为什么国外能搞，我们搞不了？过去能搞的，现在搞不出来？我对此非常难过。”在谈到我们生产的染料质量不行时说：“可以进口，学会了再自己搞。我们只能基本自给，哪能完全自给呢？需要进口的就进口。”在谈到进口罐头的质量问题时说：“产品质量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和好的工艺流程”。周总理还批判了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产品质量带来的恶劣影响。最后号召大家“一定要在‘四五’计划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发展对外贸易”。

1973年1月4日，根据周总理的意见，李先念同志在全国外贸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我国手工业品、工艺品和土特产品占去年出口总额的23%，这些商品是可以大发展的。轻工业品、水产品也大有发展前途，要积极搞。有些东西，国内生产能力有余，原料不足，国际市场又有销路，也可以进口原料，加工为成品出口。比如，可以多进口些棉花、羊毛，加工成针、棉织品和毛织品出口；也可以进口些木材加工成家具出口。还有化工、机电、石油、煤炭、矿砂等，也要逐步增加出口。我国的对外贸易应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从国内建设上看，也需要发展出口贸易。我们要进口成套设备，引进先进技术，还要进口钢材、有色金属、橡胶、化肥、粮食等。进口这些东西是需要外汇的。这样做更有利于我们自力更生。李先念同志还强调：外贸要统一对外，互通情报，不要互相保密，互相竞争，这股不正之风必须坚决纠正。同外国人做生意，要熟悉人家的政治、经济情况，随时掌握国际市场动态，做到胸中有数。这是做好外贸工作的基本功。国际市场商品价格，经常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而上下浮动。我们要根据市场规律定价。不能把国内规定的成本加利润的作价原则，运用到国际市场上去。李先念同志的这个讲话与周总理发展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1973年3月20日，经周总理同意，国务院决定选择部分企业和县社，试办出口工业品专厂、专车间和出口农副上特产品生产基地。试办的出口工业品专厂、专车间，凡是使用外汇贷款进口原料进行加工的产品，全部出口；国内外都适销的产品，按外贸收购计划确定出口数量，超产原则上都出口，不能出口的转内销，内销不出去的加工改制，其费用和损失由外贸部负担。有供应港、澳市场任务的省、市、自治区，可以有选择地建立鲜活产品和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各省、市、自治区对传统的名贵土特产品或出口的大宗农

副产品，可以在集中产区或有条件的地区建立生产基地。基地所需物质条件自行解决，解决不了的由外贸部扶植。建立出口专厂、专车间和生产基地，对于保证出口货源的稳定，增加国家的外汇收入，起了良好作用。

遵照周总理要总结广交会经验的指示，外贸部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广州交易会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出口成交过于集中在交易会进行，对于选择销售时机和进行价格斗争有不利的一面。就整个对外贸易来说，应以平时成交为主。交易会主要销售适宜看样成交的商品，规格、花伴比较简单的，国际市场上价格比较敏感的大宗商品，主要通过平时成交。交易会要以中、小客户为主要对象，以民间贸易为主，积极发展直接贸易，主要搞出口，同时兼顾进口，大宗的进口商品一般不在交易会洽谈。要重合同、守信用。签了合同就要认真按质、按量、按时执行，绝不可因价格上涨而不履行合同。”1973年9月26日，经周总理批准，国务院转发了外贸部的报告。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我国进出口贸易额，迅速扭转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连续四年（1967—1970年）下降的局面。1971年开始回升（达到48.5亿美元），1975年达147.5亿美元，比1971年增长2倍多。

（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

为了增加钢材品种，满足国内对薄板的需求，减少进口，冶金工业部和国家计委1972年8月建议从联邦德国、日本进口1.7米轧机，建在武汉钢铁公司。这个建议在周总理、李先念同志支持下，得到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武钢1.7米轧机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引进项目之一。这套设备具有大型化、自动化、高速化、连续化的特点，是七十年代的先进水平。这项工程全部概算投资为38.9亿元，其中国外引进费用22.28亿元，折合外汇为6亿美元，国内费用16.6亿元。全部建成后，按设计能力，年产300万吨热轧板卷，可加工279万吨成品板材。

1973年1月2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提出从国外进口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即“四三方案”。“四三方案”的项目，有一部分在此以前就已确定进口。“四三方案”确定后，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达到51.4亿美元，但没有全部实现。到1977年底，实际对外签约成交39.6亿美元。引进的项目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工厂和斯贝发动机项目。这些引进项目，除单机按现汇交易支付外，成套设备项目大部分采用延期付款方式。周总理在审批这些项目时强调：要坚持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方针，以提高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到1979年底，这些引进项目大部分都已建成投产，完成基本建设投资（包括国内配套工程在内）约240亿元。把“四三方案”1977年以前对外签约项目全部建设起来，共需投资260亿元。已建成投产的“四三方案”项目，不但增强了我国基础工业的力量，增添了新的工业门类，提高了现代化技术水平，填补了一些缺门产品，而且培养了一批能掌握现代化先进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这是周总理为实现初步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四五”计划任务所做的巨大贡献。

（三）关于造船、买船的问题

为了尽快地发展我国的远洋运输事业，早在 1964 年周总理就作出造船和买船同时并举的决策，并得到毛主席的同意。1970 年周总理又提出在 1975 年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轮的局面。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一方面发展造船工业，一方面在国内造船能力一时还不能适应需要的情况下，适当从国外买一些船舶，以减少每年租用外轮的大量外汇（仅 1973 年租费就达三亿多美元）。实践证明，这样做对我们是有利的。

从 1963 年到 1980 年这 18 年，我国交通部门用中国银行的 23.6 亿美元贷款，买了 553 艘船，总吨位 1017 万吨。靠买来的船所挣运输收入还本付息，到 1980 年底尚欠银行贷款 3.12 亿美元，实际上等于在 18 年的时间白赚 1000 万吨船。如果不采取用贷款买船和用运费还帐的办法，而是把运费化在租用外轮上，则钱一个不少花，船一条也买不下，将来还要化大量外汇租用外轮，显然是不划算的。到 1995 年，我国远洋运输船队拥有的船舶已达 2350 万载重吨，已跻身于国际航运大国行列。20 多年来，我国的造船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这同周总理的远见卓识、正确决策是分不开的。对这样一个正确的政策，江青攻击说：“从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一直到刘少奇、林彪奉行的都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路线’”，用以影射攻击周总理。1974 年 6 月 18 日，王洪文在几封来信上写批语，污蔑向国外买船是“迷信外国资本主义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路线”。这完全是有意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把矛头指向周总理。

（四）加快港口建设

1972 年以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加上港口职工出勤率和劳动效率低，港口压船（货物卸不下、装不上）日益严重，在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常常动员解放军突击装卸，不是长久之计。周总理多次约交通部负责人了解情况，研究解决办法。港口压船的主要原因，一是受极左思潮影响，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干和不干、干多干少一个样，影响了职工的劳动积极性。职工队伍分成两派或几派，派性矛盾越来越深，甚至发生武斗。领导干部普遍不敢抓生产。二是我国港口建设落后于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当时，全国各个港口万吨级以上的泊位总数只有 40 多个，不如荷兰鹿特丹一个港口多。这是造成压船的一个重要原因。针对这种情况，周总理一方面纠正“左”的错误，允许试行计件工资制；另一方面与国务院业务组同志商量后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加快港口建设。指定谷牧、粟裕同志组织一个班子，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港口建设计划，争取三年改变面貌。到 1995 年，我国万吨级以上泊位，已发展到 438 个。成绩辉煌。

（五）民航要“飞出去”

1973 年 8 月 2 日，周总理指示中国民航要尽快实现“飞出去”的目标。他说：“现在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了，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现代的世界，不

能锁国自守，要把‘飞出去’作为政治任务来切实规划，进行认真准备。”

当月，周总理又提出：“中国应当参加国际民航组织，参加进去发言权就大了”。随即，派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到民航总局督促落实。1974年4月22日，民航总局向周总理报送《关于民航国际通航准备的报告》。周总理阅后批送李先念同志阅转余秋里、谷牧同志负责召集有关部门开一专门会议，“审查今年（1974）下半年开始国际通航（东通日本、加拿大，西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法国）条件是否具备，保证双方往来不致发生空中导航、气象、指挥、机场起降、供应、修理、运输、食、住、安全等事故。如条件不够，必须加快准备，不能随便批准。”

1975年4月27日，周总理在医院同李先念同志谈话时，要李转告谷牧同志：“在抓港口建设的同时，也要注意抓飞机场建设。海运、空运，我们都很落后。”

（六）加强口岸管理工作

海、陆、空国际口岸工作，包括边防、港务监督、海关、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商品检验等部门的业务。当时存在领导不统一、政策法规执行情况不好，工作效率低，服务质量差等问题，不适应国际间人员往来、货物运输迅速发展的要求。周总理责成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研究并提出改进意见。国务院于1973年2月15日发出《关于口岸工作情况和改进意见》的通知。提出了加强口岸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建设、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涉外政策、改进口岸业务工作和服务接待工作、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充实口岸工作急需的工具设备等整顿措施。

（七）发展旅游事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国的旅游工作基本上停下来。发展国际旅游，既可以增进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谊，使外国游客了解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又可以增加外汇收入，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开展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来大陆旅行探亲，是广大炎黄子孙的迫切要求，做好这方面的接待工作，更有其特殊重要意义。

周总理一向重视旅游工作，并且把旅游工作列为民间外交工作的一部分。1971年4月7日，周总理在接见旅游工作会议代表时，批判了对外关系中的极左思潮，传达了毛主席对旅游局1971年接待外国旅游者计划报告的批示：“人数可略增加，右派也可来一点”。周总理说：“从1971年开始，我们开展了新的外交攻势，首先从乒乓球队开头。”“我们要打开外交战线，允许外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一个新阶段。这次把各地管旅游工作的同志找来开会，原因就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新时期。不久以后，参加31届世界乒乓球赛的许多国家的球队要到中国来。美国乒乓球队也想来，我们同意他们来，美国记者也可以来。我们今天请这么多人，就是为了让大家胆子大一点，积极发展旅游事业。”

为了发展旅游事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国务院先后决定，恢复华侨旅行总社（后改名为中国旅行社），负责统一领导和承办华侨、港澳台同胞和一般外籍华人旅行和探亲等业务；逐步恢复和健全各地国际旅行分社和支社

机构，负责接待外国来华旅游者；北京等 18 个开放城市和革命圣地，年内出版游览图、革命圣地和名胜古迹介绍材料，其它各地省会和中等城市，也应在今明两年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国务院针对外宾到书店购书，有的卖给、有的拒绝的情况，规定：书店公开出售的书籍允许外宾购买；对外保密的书籍，不要在书店陈列。国务院还通知各地区各部门，要正确对待有海外亲属的人员，不要歧视，应一视同仁。广东省根据周总理、李先念同志对华侨接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的指示，对全省的接待工作进行了三个多月的整顿，并向国务院写了专题报告。国务院将广东省的报告批转各省、市、自治区，要求各地能像广东省那样整顿服务工作。

周总理还对接待外宾和华侨、港澳台同胞的宾馆布置指示说：“宾馆的布置要朴素大方，要体现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艺术水平，要有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要陈列国画”。有关部门据此精神在北京、上海等地组织美术工作者创作一批国画。改变了当时普遍以毛主席语录做装饰的情况。

但江青集团借此攻击周总理。

1974 年 2 月 15 日，于会泳等秉承江青旨意，开始在中国美术馆和人民大会堂举办所谓“黑画”展览。展出 18 名作者的 215 幅美术作品。这些作品都是有关部门根据周总理指示组织创作的，并用于宾馆装饰和外贸出口的。在于会泳等布置编写的展览“前言”中特别点出：这些画的产生，“是得到某些人公开鼓励支持的”，“特别值得我们深思”。遭到批判的 18 位艺术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多数是从“五七”干校调回搞创作的。他们不计报酬，为国家作奉献。他们的作品，不是什么“黑画”，而是艺术珍品。

（八）对外开放的措施

在我们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孤立和封锁之后，周总理对外经济和科技交流的指导思想，不仅限于上述范畴，他还有对外开放的意图。

从 1971 年 6 月到 1973 年 11 月，周总理先后会见来我国访问的加拿大工商和贸易部长佩潘，法中友协主席贝特兰，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洛克菲勒，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都曾讲到我们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是被动的，是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孤立和封锁，逼着我们搞自力更生。我们实行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现在既然有许多国家愿意跟我们做生意，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下，我们也愿意进行这种贸易。对外国的先进技术我们要学习，愿意购买。

1972 年 10 月 15 日，外交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同东欧一些国家进行科技合作项目的请示报告》，周总理阅后表示不同意这个《报告》：“为什么不派人去伦敦、巴黎、波恩、渥太华、东京去研究西欧、美、加、日本的机械工业情况，反而求其次？”周总理这个指示表明，他主张根据新的情况适当调整对外科技合作对象。西欧、北美、日本的机械工业技术水平比东欧国家高，过去我们同西方国家没有进行科技合作的条件，现在有了合作的可能，不应当再局限于老的科技合作的伙伴。

1973 年 2 月，在国务院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周总理曾提出开发山东省兖州地区的煤矿，作为煤炭出口基地。同时，建设石臼所港（即日照港），修建兖州到石臼所港铁路。要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进行研究。周总理的这

个设想、列入了国家计划，早已变成现实。

1973年4月16日，周总理在审阅修改出席联合国工业发展理事会的中国代表团发言稿时，强调“自力更生，绝不是关起门来，排斥真诚有效的国际援助。各国应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下，开展经济交流，取长补短。这对于自力更生地发展本国工业，也是有利的。”

1973年6月29日，周总理在同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洛克菲勒谈两国贸易时说：一年两次的广州商品交易会，是在我们被封锁的情况下，不得已搞的，我们只好请人家进来看。因此，我们对国际上究竟哪一个国家需要什么货物并不清楚。我很坦率地说，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台湾的贸易额之所以这么高，这两年我们通过调查才清楚了。它吸收了一部分外资，此外，台湾的劳动力也很便宜。中美两国是大国，双方不可能不发展一点贸易，必须找到合适的方法。这需要研究对方，了解对方。

1973年10月31日，周总理会见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时说：台湾有一个高雄港，是自由港，没有税。蒋介石在那里吸收外资带着原料去建厂，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然后把商品回销外国。这样，吸引很多外商到台湾投资。周总理对台湾的作法表示肯定，有学习和借鉴的意思。我记得1973年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周总理半开玩笑地对李强同志说：“你这个外贸部长不如严家淦，人家在高雄搞了个出口加工区，把外贸发展起来了”。周总理接着又说：“这当然不能责怪李强同志，我们过去没有这个条件。现在情况变了，我们应当多想点办法。”

周总理的这些谈话和批示，清楚地表明，他在对外经济和科技交流领域，有一个开放的思想。但是，在当时党中央不可能做出类似现在的对外开放的决策。周总理只能在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范围内开展工作。

尽管如此，周总理的主张仍然遭到江青集团的疯狂反对。例如，1973年9月16日，经周总理、李先念同志批准，从美国引进彩色显象管生产线，以尽快解决国内生产彩色电视机的需要。当年，四机部曾派人到美国康宁公司进行考察，康宁公司送给考察组每人一个小礼品——玻璃蜗牛。1974年2月10日，江青抓注这根稻草大作文章，她亲自到四机部讲话说：“这是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引进彩色显象管生产线，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命令四机部把“蜗牛”退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去，并提出抗议。

周总理要外交部查明事实真相。经外交部调查，原来“蜗牛”在美国是一种工艺品，常作礼品和陈设之用，康宁公司赠送这个礼品并无恶意。周总理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收回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挫败了江青的政治阴谋。但是，在“蜗牛”事件影响下，引进彩色显象管生产线被推迟好几年。江青集团并没有因这次失败而善罢甘休。他们不断攻击正常的进出口贸易是“崇洋媚外、洋奴买办、投降卖国”。1975年3月13日和6月25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时，江青一伙又把出口原油、煤炭，进口化肥、化纤等成套设备，骂为“洋奴、卖国、汉奸”，污蔑“外贸部有一批卖国主义者”、“政治局内部有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胡说：“你们崇洋媚外，买那么多破烂，不知外国公司给了你们多少钱。”他们还攻击建立煤炭出口基地是“租让给外国”。“四人帮”根本不讲道理，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完全是捣乱破坏。他们的罪恶目的是打倒周总理、邓小平同志。

国务院实行的进出口贸易政策和重要的进出口项目，都是经过毛主席和

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周总理和邓小平、李先念同志不顾“四人帮”的反对，仍然坚持按既定方针办，使“四人帮”无可奈何。

从上述周总理为发展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与科技交流而进行的国务活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一、建国后二十二年间，我国同西方国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几乎处于隔绝状态，完全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采取敌视政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造成的。绝不是我们愿意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我国政府是主张发展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技术交流的。

二、尽管周总理有对外开放的思想。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要实行类似现在的对外开放政策，在党中央是难以通过的。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毛主席是支持的。虽然江青集团不断进行干扰破坏，但是决定这方面政策的主要是毛主席、周总理，不是“四人帮”。

三、多年来，西方传媒歪曲历史，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长期进行孤立和封锁，说成是我国实行“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政策，这是为了掩盖其长期敌视中国人民的霸道主义行径，转嫁罪责。遗憾的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报刊发表的文章中也有这种说法。希望有关同志注意研究实际情况，作具体分析。

十一、关于批林批孔和组阁的斗争

(一) 关于批林批孔

1973年8月5日，毛主席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提出：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制，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毛主席还念了他写的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表达他评法批儒的观点。次日，江青在周恩来同志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主席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及所写七律诗，并要求将此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周恩来同志表示，对此需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

8月7日、13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写的《孔子一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和《西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两篇文章。之后，一些报刊开始登载有关批孔、批儒的文章和评论。不久，总理值班室赵茂峰同志向我传达周总理的指示：总理值班室、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务院政工小组的同志要研究诸子百家，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同时，要读点马列的书，用马列主义观点进行研究。第二天，我向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务院政工小组的各位负责同志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研究了贯彻执行的办法。主要是读一些书，请学者专家讲课。开始，我认为研究儒法斗争史的目的，在于认清法家的改革思想在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批判并肃清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保守思想的消极影响。以后，从“四人帮”的御用工具梁效、罗思鼎等在报刊上发表的批孔文章、特别是“四人帮”的讲话中，才逐渐明白，“四人帮”以批林批孔为名，实则影射攻击周总理。

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主席，建议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称这份材料“对当前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毛主席阅后批示：“同意转发”。18日，中共中央发出转发通知。之后，在全国展开批林批孔运动。毛主席所以要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是由于他对批林整风中批极左带来的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否定不满。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深刻地变革，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它与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儒家反对变革，有类似之处。他想借批林批孔运动对干部进行一次思想政治教育，以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防止“右倾翻案”。然而，“四人帮”则另搞一套，他们借批林批孔更加变本加厉地反对周总理，妄图通过“批林批孔”打倒周总理。

1974年1月、2月间，江青以个人名义连续给中央国家机关、军队领导机关、连队、科研部门以及下乡知青等写信、送材料，要求他们“批林批孔”。还派迟群等人到海军、空军等单位“点火放炮”。

1974年1月24日，江青给军委领导人写信，批评军队批林批孔“深入

不下去”，要派迟群、谢静宜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通知。24日下午，江青等擅自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大会。25日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召开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工作人员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这次会议，表面上由周总理主持，实际上周总理是临时接到通知来的，他事先不知道会议内容。在江青的策划下，迟群、谢静宜在会上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借介绍《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产生过程，大谈所谓“反复辟”的主题，强调“批林批孔”要联系的现实之一，就是批“走后门”。江青、姚文元不时插话，大谈他们如何查到林彪的孔孟言论，毛主席是怎样让他们整材料，指示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要反复辟，反右倾回潮，批判修正主义。江青一伙在会上神气十足，气势汹汹，连迟群、谢静宜这两个江青的爪牙，也竟敢置周总理、叶剑英同志等老一辈中央领导人于被指责的地位。

迟群在会上，提到意大利摄影师安东尼奥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大骂这是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并说要进行批判。安东尼奥来中国拍纪录片是经周总理批准的，而且所拍摄纪录片《中国》也没有什么原则问题。迟群恶毒攻击的矛头显然是对着周总理的。江青还当众斥责郭沫若同志“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夫子的态度，如林彪一样”，并几次点名批评，当场让郭老站起来，真是狂妄至极！会后，周总理担心郭老难以承受江青的侮辱，当晚，派人前往郭老家中了解情况，传达保证郭老安全、健康的几点意见。

周总理看到这种情况，忧心如焚，眼看着国家又要陷入混乱。这场运动又是毛主席发动的，他无力阻止。但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不顾一切，当机立断，让秘书连夜突击，把大会上江青等人的发言整理出来。第2天周总理审阅了整理出来的稿子，在他认为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划了横线，并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一起送给毛主席。以后，毛主席对江青私自召开“一·二五”大会，以及他们的言论作了批评，并扣发了他们精心炮制的准备下发的材料。毛主席说：“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这个批评使江青一伙暂时有所收敛。但是，毛主席决定的“批林批孔”运动，仍然继续进行。此后，“四人帮”的工具“梁效”、“罗思鼎”等倾巢出动，在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以古喻今，影射攻击周总理。

1973年11月1日，罗思鼎撰写、经姚文元修改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一文，在《红旗》杂志发表。该文借批“宰相”、“批折中主义”，影射攻击周总理。

1974年4月1日，江青一伙操纵的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在《人民日报》发表《孔丘其人》一文，文章使用比附手法，将春秋时期鲁国根本没有的“宰相”职务加上孔丘身上，以此影射周总理。

此后，江青一伙操纵的写作班子，以史喻今，影射、比附的文章纷纷出笼，借批孔之名，对周总理进行露骨的政治诬陷和人身攻击。《北京日报》发表的柏青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在描写孔子见国君的一段文字中，凭空加上“端起胳膊”4个字。文章执笔人以后承认：“这是借批孔之名，对总理搞政治陷害和人身攻击”。还有些文章在批判孔丘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时，把“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干部重新安排工作，说成是“举逸民”。当时，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根据周总理、李先念同志的指示，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正在建设一批住宅，拟安排已经解放，原住房被人挤占的部分老干部、爱国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居住。“四人帮”的爪牙曾前往观

看，称这些房子为“逸民楼”、“复辟楼”，公然攻击周总理和拟去居住的同志们。

1974年6月中旬，江青等人召集“梁效”等写作班子成员开会，江青说：“现在要批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的现在的儒。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不然，不会搞这样大的运动。”之后，江青又跑到天津去，在一次讲话中露骨地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现代的大儒”。很明显地暗示，要批判和打倒周总理。

在“四人帮”恶毒攻击面前，周总理沉着应战，他相信广大干部和群众是能够分辨是非的。实际情况也是这样，跟着江青一伙反对周总理的寥寥无几。当时，传说毛主席讲：“反周民必反，反周国必乱”。毛主席是否讲过这个话，不得而知。这种传说反映了人心的向背。

周总理对于批孔有自己的看法。1974年1月27日，

周总理和中央政治局成员一起接见中央读书班和记者学习班的代表，并就批林批孔问题发表讲话。周总理说：“批孔是挖‘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社会根子，故必须多做社会调查。批林批孔是一场长期、尖锐、激烈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故必须进行试点。批林批孔可与目前城乡正在开展的批林整风、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教育结合进行”。1974年4月22日，周总理接见日本自民党前众议员川崎秀二，在谈到“批孔”时说：“我们这一代都是反对孔子的，从五四运动起，就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孔子的思想在中国社会已影响了两千多年，批判并肃清这种影响，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件大事，并且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在批孔的同时，还要对历史上改革派的思想进行宣传。当然，我们不是继承法家，今天马列主义哲学思想已远远超过了法家。”从周总理这两次谈话，联想到周总理指示我们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诸子百家，使我产生这样的理解：法家也好，儒家也好，都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要研究，就必须对他们采取分析的态度，不仅需要看书，还需要进行社会调查，并在这个基础上分清哪些应当吸收，哪些应当放弃。简单地肯定或否定，都是不恰当的。肃清孔子的消极影响，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用搞运动的办法是不适当的。对孔子的思想也不能一概否定，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江青一伙为什么对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敢于如此放肆地进行攻击。这同1973年7月、11月和12月间，毛主席对周总理连续三次小题大作的批评，对江青等人起了鼓励作用是分不开的。7月份的批评，是外交部的一期《新情况》简报，对勃列日涅夫访美同尼克松签订《苏美防止核战争协定》、《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等文件，提出这是美苏合作，欺骗世人，妄图主宰世界的看法。周总理曾同意这种看法。毛主席不同意这种分析。毛主席为此找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指出：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了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然后，毛主席要王、张管管外交部的事，并说：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上他们的贼船。又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毛主席在这里不点名地指责了周总理，批评是相当重的。外交部属周总理主管，毛主席不找周总理，而找王、张，其含义可想而知。

11月份的批评，是毛主席认为，周总理与美国基辛格会谈时，犯了所谓

“右倾错误”。并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当晚，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主席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斥责周总理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之争辩。之后，从11月21日至12月初，中央政治局在王洪文主持下，连续召开全会、分组会和扩大会议共五、六次，批评周总理和叶剑英同志在同基辛格会谈中的所谓“右倾错误”。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总理和叶剑英同志进行围攻，指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江青、姚文元提出这是“第11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总理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之后，江青还将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主席。12月9日，毛主席先后同周总理、王洪文谈话，提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11次路线斗争”，不应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指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于江青所提增补常委的意见，毛主席表示：“增补常委，不要”。

12月份的批评，是在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会上毛主席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前行是批评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同志，后者是批评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同志，这是不言自明的。

毛主席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连续三次批评周总理，客观上为“四人帮”向周总理发动进攻鼓了气、壮了胆。

“批林批孔”运动，特别是“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总理，指向一度被打倒重新恢复工作的老干部；他们把各条战线纠正极左错误、落实党的政策，一概诬蔑为“修正主义复辟、回潮”，各地的造反派闻风而动，又开始胡作非为，揪斗领导干部，冲击领导机关，抢档案；包围银行强行提款；提出“不为错误路线生产”，搞停工停产；有的地方又开始抢夺解放军的武器，准备武斗等等。致使“批林整风”以来经过周总理和全党同志的努力刚刚趋于稳定的政治局势，又重新动荡起来。逐渐有所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又遭到破坏。

在问题暴露后，也只能在这个时候，周总理提出治乱的意见，才能被毛主席接受。当时毛主席也不愿意再把局势搞乱。在周总理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先后采取一些治乱措施。197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就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若干问题发出通知，规定：

- (1) 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成立战斗队一类的群众组织，不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
- (2) 原“三支两军”人员，不再回支左单位参加运动；
- (3) 各级党委应认真加强领导，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使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

5月18日，中共中央就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几个政策问题发出通知，强调在运动中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防止扩大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7月1日，鉴于从4月份开始，工业生产明显下降的情况，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不准揪干部，不准打人抓人，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和其他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把打内战、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等等。

7月17日下午，毛主席离京前，约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交待工作。周总理从医院赶来参加。江青一伙在会上指桑骂槐地大谈批“现代的儒”，不点名地指责周总理阻碍“文化大革命”。看到江青一伙如此猖狂地攻击周总理，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大都很气愤，有的还义正词严地要江青把话挑明。江青尽管那样猖狂，但还是不敢公开说周总理是大儒。毛主席看到江青一伙这样胡搅蛮缠，在研究国家大事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如此放肆撒野，因此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你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帽子。”“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呢！”又对江青说：“你也是难改呢”。毛主席当众宣布：“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在党内高层提出“四人帮”问题，其意义重要而深远。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评，使他们不得不暂时停止胡作非为。至此，批林批孔运动名存实亡，逐渐停下来。江青一伙利用“批林批孔”妄图用栽赃笔伐的办法打倒周总理，又以失败告终。但是，“四人帮”绝不会甘心，他们还要伺机卷土重来。

1974年10月4日，在武汉的毛主席，根据周总理设第一副总理的建议，电话告王洪文，要王告周总理，由邓小平同志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王洪文将毛主席的电话内容先告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过了几天，才告诉周恩来、邓小平同志。毛主席让邓小平同志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表明他已经清楚“四人帮”在党内、党外十分不得人心，他培养的接班人王洪文并不争气，由他们掌握党和国家的大权，党心民心不服，国家不可能稳定。在周总理病势越来越重的情况下，毛主席下决心，由邓小平同志逐步接替周恩来同志的工作。

（二）关于四届人大“组阁”问题

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四届人大的召开，加上毛主席强调安定团结，表明毛主席要结束混乱局面，恢复国家生活的正常秩序。但是，“四人帮”企图利用召开四届人大这个机会“组阁”，以夺取国家的权力。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及时发现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同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

“四人帮”对毛主席决定由邓小平同志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极为不满。他们正在阴谋策划阻止邓小平同志担任第一副总理的时候，碰巧国产“风庆轮”远航归来，“四人帮”趁机又挑起事端，借此猛攻周总理，并企图“整倒”邓小平同志。

“风庆轮”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

“风庆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载重量13500吨。当时，交通部远洋局曾担心国产主机和雷达等设备性能不适应远航，为了安全，规定“风庆轮”跑近洋。1974年初，“批林批孔”时，江南造船厂提出“我们要革命，（风庆轮）要远航”。周总理知道后，查明了情况，同意这条船出海远航，作了五条指示：“一是要派工作组到船上，随船工作；二是配件要备足；三

是干部、船员要配双套班子；四是要派一条技术条件好的船跟随‘风庆轮’保‘驾’；五是开船要对船只进行全面检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派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事顾广文随船工作，李任政委，顾为政治干事。

“风庆轮”的质量确实不够好，在远洋过程中，主机不断发生故障。李国堂都如实记录下来。再者，“风庆轮”在毛里求斯停靠时，我驻毛里求斯大使馆把样板戏《杜鹃山》影片送到船上。上映前，李国堂说这个样板戏我看过，江青搞的样板戏都是些女英雄。其他人也对船的质量和样板戏有些议论。这本来是正常的，但是在那不正常的年代就成了莫大的“罪过”。王洪文的耳目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并整理了材料。船到上海后，王洪文下令把李国堂扣留在上海，进行批斗，并责令交通部严肃处理。10月12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都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宣称：“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声称：“不是国产船和国产船的主机有问题不能远航，而是有些人崇洋媚外，思想路线有问题”。江青10月13日在《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的报道上作批语，并给在京政治局委员写信，称：该报道“引起我满腔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一个部？”还说：“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有个表态，而且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在江青的信中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意见，要求抓住“风庆轮”问题，“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邓小平同志圈阅了该信，周总理批了“已阅”二字。10月17日晚，江青等在中央政治局会上继续借“风庆轮”事件发难，有预谋地围攻邓小平同志，影射周总理，轮番逼着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同志马上表态。邓小平同志就是不表态，强压怒火，反唇相讥道：“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嘛，你们怎么这种态度！”后来干脆说：“我要调查”，当场进行抵制，会议不欢而散。当晚，江青一伙紧急策划，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主席告邓小平同志和周总理的状。

10月18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和周总理飞抵长沙，借向毛主席汇报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诬陷邓小平、周恩来同志，说：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又说：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入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还向毛主席吹捧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毛主席听后，当即批评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并要王回京后多找周恩来、叶剑英同志谈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提醒王要注意江青。王洪文告状不成，碰了一鼻子灰。

10月9日，江青得知王海容、唐闻生同志将随邓小平同志陪丹麦首相去长沙见毛主席，即召见王、唐二人，要她们向毛主席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问题，并攻击邓小平同志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表现是又一次“二月逆流”。同日，周总理与王海容、唐闻生同志谈话，指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同时表示继续做些工作，慢慢解决问题。1974年10月20

日，在长沙的毛主席听取王海容、唐闻生同志反映“风庆轮”事件的实际情况后，对江青等人的作法表示不满。指出“风庆轮”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且李先念同志已经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他让王、唐回京后向周总理、王洪文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毛主席还要王、唐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谈话中，毛主席赞扬了邓小平同志，并再次建议邓小平同志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974年11月6日，周总理致信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及进展情况。在谈到人事安排时，明确表示：“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1974年11月12日，邓小平同志陪外宾去长沙，向毛主席汇报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争论情况，并认为政治局内生活不正常，还谈及自己同江青面对面斗争事。毛主席听后表示赞同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和作法，指出：“她（指江青）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毛主席勉励邓小平同志继续努力，放手工作。

同日，毛主席在江青的一封来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人贵有自知之明”。以后，江青又托人向毛主席提出，要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毛主席即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并让人转告周总理：“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为国务院副总理。其他，由周总理主持安排”。

1974年12月21日，周总理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会上，江青、张春桥等竭力设法将其亲信安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会后，周总理同李先念、纪登奎同志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以周荣鑫同志掌管为宜，文化部、体委可作些让步。

1974年12月23日，周总理抱病乘专机飞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工作筹备情况。王洪文另机前往。12月23日—27日，毛主席在长沙听取汇报过程中，同周恩来同志和王洪文多次谈话。主要内容：一、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二、高度评价邓小平；三、提出“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四、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及其人事安排问题；五、关于国际形势问题。12月26日，周总理在长沙同毛主席单独长谈。毛主席谈了理论问题。毛主席还提出，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毛、周商定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

1974年12月29日，周恩来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主席在长沙的几次谈话内容和关于理论问题等指示。1975年1月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有关人事安排问题。根据毛主席一再提出的要安定团结的指示，会议确定了“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讨论通过了邓小平同志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的人选。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8日—10日，中共第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同志主持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四届人大的各项文件。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央

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闭幕前，周恩来同志问毛主席有什么话要向大家讲？毛主席说：“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1月13日—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的议程是：一、修改宪法；二、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三、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周总理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重申了1964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7日，会议批准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大会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十二人为国务院副总理。大会通过其他议程后胜利闭幕。

2月1日，周总理主持召开四届人大批准组成的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一次会议。周总理在讲话中，传达了毛主席在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所作的人事问题和理论问题的指示。重提了毛主席关于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价。最后说：“今天是开始，恐怕我也只能够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今后这样的会议，请邓小平同志主持”。“希望新的国务院成立以后，出现新气象，争取今年第四个五年计划能够完成而且超额完成”。

在毛主席的支持下，周总理等老一代革命家粉碎了江青一伙的“组阁”图谋，取得了重新“组阁”的胜利。这一胜利，意义是重大的。如果让“四人帮”得逞，对党、国家和人民必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周总理在“组阁”问题上同“四人帮”的斗争，绝不是争个人的权力。这不仅毛主席清楚，而且“四人帮”也是明白的。因为周总理得的是不治之症，他将不久于人世。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由邓小平同志接周恩来同志的班。在邓小平同志被打倒后，为了保护他，为了让他复出，为了让他接班，周总理作出了极大的努力，真可谓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在这个问题上，周总理和毛主席主张一致，这是粉碎“四人帮”“组阁”图谋而由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继续“组阁”的决定因素。

十二、关于反经验主义和评《水浒》

(一) 关于反经验主义

1974年12月26日，毛主席在长沙同周总理单独长谈，在谈到理论问题时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他又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的这个谈话，引导人们把按劳分配、商品交换看作是资本主义性质或者是容易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四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在现阶段，批判和限制按劳分配和商品交换制度，是十分有害的，必然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发展。

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社论，公布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中的一段话。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对理论问题指示的通知，要求将毛主席指示发至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群众。22日，《人民日报》刊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33条语录。由此，全国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然而，“四人帮”又利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反对周总理1972年前后批判极左思潮、纠正“左”的错误，反对邓小平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他们提出“反经验主义”，煽动“打土围子”。

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借用毛主席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关于“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一语，说：“据我看，主席的活现在仍然有效”，大讲反对经验主义。1975年4月1日，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在《红旗》杂志发表。该文提出：“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江青、王洪文还分别找中央政治局成员谈话，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大敌”。邓小平同志当时就表示反对，说：“这是在政治局内一个一个动员反总理”。江青4月4日在接见工人代表讲话时称：“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4月5日，江青对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人员讲话时又提出：“党现在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他们把周总理1972年前后批判极左思潮所采取的各项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借以攻击周总理等具有丰富经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后来又重新分配工作的领导干部。他们提出“打土围子”，是要把那些反对“文化大革命”极左行为的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比作民主革命时期在“土围子”中的敌人，要对这些人进行所谓全面专政。此后，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布置下，“四人帮”把持的一些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批判“经验主义”。4月中旬，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一再提出反经验主义问题，并要求中央政治局讨论，受到邓小平同志的抵制。4月18日，邓小平同志借陪毛主席会见金日成的机会，向毛主席汇报了自3月以来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问题，并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主席表示同意邓小平同志的意见。

1975年4月23日，毛主席对姚文元所送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两者都是修正马列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又提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人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并告“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1975年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贯彻毛主席4月23日指示精神。会上，叶剑英、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严辞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并对江青1973年1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进行其他“四人帮”宗派活动问题，提出尖锐质问。江青被迫作检讨。会后，王洪文以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为名，致信毛主席，诬告周总理、叶剑英、邓小平同志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并称：“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

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主席对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等“四人帮”的宗派活动问题，提出尖锐批评。毛主席提出：“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佯搞呀？为什么不和二三百多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会上，毛主席还当面批评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5月4日、5日，周恩来起草了一个关于学习毛主席理论问题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意见稿结合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内容，谈了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认为，在学习过程中，需要“在一定时期有针对性加以宣传”，“把主席指示的反修防修的目的说清楚”。对犯一般经验主义的人，“要慢慢来教育改造”。又指出：“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有些报告、报刊社论、文章、新闻报道、内部清样中，只强调反修正主义的一项经验主义，放过另一项教条主义，有些地方甚至连反修正主义主题都不提了，这不能不是一个错误。报纸全国转载，清样有时转至各地，军队报告发至下层，这不能不引起一部分地区、部队和一部分机关、学校，弄得争论不休，或者年老干部又不敢负责工作。因为有文章上说，资格老、能打仗的人就有背上经济主义包袱的”。同意“由中央发一个从理论到政策的文件”。对于毛主席指出的江青等人的“这次错误”，表示“拥护主席意见”，“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此外，“同意小平同志意见”，“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关于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手续问题，强调“政治局工作，必须遵守九大、十大方针路线，‘三要三不要’，以安定团结为好”。“凡要议大事，先在政治局常委谈一谈。各单位拟好文件的，除外事、国防事急需立即传阅送批外，其它总要在二、三天前先行送阅待议。政治局同志

有意见（除小事急事外）需提政治局讨论的，请先向主持人在两三天前提出。个人除自己管辖的单位外，其它需下达的事，必须经过政治局常委会或主管部门同意后，以机关名义下达。个人交换意见，不能以个人或机关名义下达下送文件。个人通信，不能以指示口气来信和通电。”周总理的这些意见，都是针对江青一伙反经验主义和江青的胡作非为的。

5月21日，周总理为了使中央政治局成员了解“四人帮”发动“反经验主义”的情况，开好讨论贯彻毛主席指示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就5月4日、8日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传达毛主席4月23日的批示和5月3日讲话事，致信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介绍常委会会议所商意见后，着重对“四人帮”发动“反经验主义”的有关情况作出说明，指出：姚文元文章中提了，“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之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也是根据姚文引用的。而小平同志向毛主席反映的，是指3月1日张春桥在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同志阅后在此处注：“当时还提到江青同志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反经验主义问题”），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讨论情况的三、四月份电报中可以看出。现在政治局即开正式会议讨论主席批示和指示，特补写如上说明。如大家同意，亦请将此信转主席一阅。

这封信传到张春桥时，张春桥批道：“总理的信，有些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随后，周总理致信张春桥，回驳张所谓“不确切”的说法。在重述张于批林整风中就表明应批判经验主义的思想后，指出：“这次，主席指示要把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才会防止变修正主义，如果不把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阐明和限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就很容易。因此，要看点马列的书，还要你写文章。因此，你联系到十多年的思想，经验主义者由于不多读书，难于总结经验，易于上反党集团的当，甚至陷进去，故你在3月1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这在三、四月中各政治部向总政来电反映讨论情况，也能看出。”“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在周总理的严肃质问下，在事实面前，张春桥只好写道：“不再改了。”

5月27日、6月3日，根据毛主席5月3日讲话精神，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集中批评江青等人。毛主席5月3日讲话之后，周恩来同志因病不能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便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召集，但王拖延不开。后毛主席与周恩来同志商定，改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5月27日会议上，邓小平同志作了中心发言，首先谈了对毛主席5月3日讲话的理解，提出“主席这篇讲话，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席是对政治局讲的，是党的核心。主席提出要政治局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然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件事，要江青等人讲清楚：“一是前年12月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批经验主义。倒是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在6月3日会议上，叶剑英同志就邓小平同志5月27日发言中提出的“三件事”，再作长篇发言，继续批评、质问江青等人。在中央政治局成员集中对批评“四人帮”的形势下，王洪文、江青在会上被迫作了检讨。邓小平同志

表示“讲多少算多少”，要将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主席作报告”。至此，“四人帮”借学习理论大反经验主义的阴谋诡计，遭到破产。

（二）关于评《水浒》

1975年8月14日，毛主席对陪读人员就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一书发表看法。他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们都知道投降派。”又称：书中农民起义军领袖宋江“屏晁盖于108人之外”，“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当天，姚文元得知后致信毛主席，称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很重要”，对“现在和将来”、“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姚建议将毛主席的评论印发政治局在京成员和有关宣传、出版部门，以“组织或转载讨论文章”。毛主席在姚信上阅批：“同意”。之后，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谈话。

“四人帮”又抓住这个机会对周总理等人进行恶毒攻击。8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8月28日和9月4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关于开展对《水浒》评论的社论，提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

1975年9月7日，周总理不顾病情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再三劝阻，会见以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为首的罗党政代表团。在回答客人提问并介绍自己病情时，但然说到：“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又说：“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这是周总理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1975年9月15日，周总理与人谈话中，就近期报刊宣传上开展对《水浒》评论事指出：他们那些人（指“四人帮”）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

1975年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开幕式上讲话，指出不仅军队要整顿，地方也要整顿，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文艺政策等。江青在会议期间大讲评论《水浒》的所谓“现实意义”，提出评《水浒》“是有所指的”，“要联系实际”，“《水浒》里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事后，毛主席严厉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文不对题”，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江青一伙借评《水浒》诬蔑攻击周总理的阴谋又失败了，只好收场。

十三、“这是最后的斗争”

1975年9月20日，周总理病情急剧恶化。下午施行大手术治疗。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邓颖超同志和张春桥等在医院守候。这次手术生死未卜，周总理当着张春桥的面，以特殊的方式，同“四人帮”进行斗争。进入手术室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已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了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之后，躺在平车上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邓小平同志即上前俯身问候，周总理握住邓小平同志的手，用力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进入手术室时，周总理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同志要汪东兴同志将此情况报告毛主席。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同志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975年11月，尽管邓小平同志在这一年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毛主席不能容许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基本停止了邓小平同志的工作，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5年周总理在同叶剑英同志谈话中嘱咐：“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指四人帮）手里。”

1976年1月2日，虽经医疗组全力抢救治疗，周总理的病情仍继续恶化。在极度病痛中，周总理要来《国际歌》唱片，用微弱的声音同邓颖超同志一起低声吟唱：

……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
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伟大的周恩来，敬爱的周总理，病逝于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他带着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离开了人间。他的逝世，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中引起巨大的悲痛！

11日下午，周总理的遗体送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从北京医院至八宝山的东面数十里长街上，首都百万群众自发聚集在街道两侧，在寒风中肃立致敬，送别周总理。当时，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送灵，我亲眼看到灵车所到之处，哭声四起，连绵不绝，气氛悲痛至极。我也为失去敬爱的总理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

周总理逝世后，“四人帮”对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横加限制，激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愤怒。当年的清明节，首都百万群众连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自发地举行更大规模的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使全国性的悼念、抗议活动达到高潮。什么样的路线和政策受到人民的拥护，什么样的路线和政策受到人民群众的反感，准是谁非，人民群众已经作出了公论。公道自在人间。

结束语

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为党、国家和人民做出的重大贡献、在他逝世的时候，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党中央没有、也不可能做出正确评价。只有在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之后，才能做出正确的结论。

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全面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决议》实事求是地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负责。同时又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 he 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

《决议》对周恩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的功绩，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决议》说：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政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1972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

《决议》对周恩来同志做出这样的评价，足以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的健康力量同“左”倾严重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同志是站在正确方面的，是有功的。这是党的评价，历史的结论。

“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二十余年，现在谈论它的是非功过，不仅是为了让人们知道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为党、国家和人民作出的历史贡献，更重要的是为了继承周总理和已故的其他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吸取“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防止再发生类似严重错误。毛主席在他的晚年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不尊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搞个人专断；他不尊重宪法、法律、党章，不受它的限制和约束，为所欲为；他听不得不同意见，顺我者重用，逆我者遭殃，

致使动乱延续十年之久，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的损害，只有在他逝世后才能纠正。这暴露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很不健全，尤其是对党的领袖，而且是具有崇高威望的领袖，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必须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地正确地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国家，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这个《决议》十分重要，它是党和国家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纲领。我相信，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一定能够逐步落实《决议》提出的各项民主政治建设任务，一走能够切实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断完善，以保障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能够顺利进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当前，我国各族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我国的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在稳步前进；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各族人民同心同德，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所有这一切，可以告慰敬爱的周总理。

附：

**坚持预防为主方针
最大限度减轻地震灾害**
——回忆周总理在邢台地震后对
有关地震工作的指示
吴庆彤

敬爱的周总理已经逝世 20 年了。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永垂青史，光照人间。

1966 年的邢台地震，是建国后在人烟稠密地区发生的一次破坏性极大的地震，造成的灾害十分严重。在周总理的领导下，成功地进行了抗震救灾工作，各项应急措施及时有力，在不长的时间里治愈了地震创伤。周总理还以邢台地震为契机，高瞻远瞩，对地震科研和建筑工程抗震防灾工作，做出了重要决策。周总理在地震工作领域里的指导思想，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在邢台地震 30 周年和周总理逝世 20 周年的时候，回忆周总理对有关地震工作的指示和期望，进一步加强地震科研工作和抗震防灾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长期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在 1966 年邢台地震后，周总理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抓抗震救灾的时候，我参加了有关的会议，承办了日常事务，因而对周总理关心我国地震工作的情况，有所了解。

（一）周总理两次到地震灾区视察，亲自指导抗震救灾，并提出了救灾工作方针。

1966 年 3 月 8 日和 22 日，邢台地区连续发生两次强烈地震。造成 8064 人死亡，伤 38451 人，倒塌房屋 508 万间，许多工厂“遭受破坏而停产，多处公路、铁路、桥梁和通信、输电线路受到严重破坏。3 月 8 日地震，发生干凌晨 5 时 29 分，北京地区房屋晃动，明显有感。周总理凌晨 3 点多才休息，地震一发生，立即要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迅速查明震中位置和受灾情况。当时，我国监视地震活动的台站很少，地震灾区通信线路遭受破坏，地震情况不能立即查清楚。天亮后，铁道部和邮电部先后报告了石家庄——邯郸之间的有线通信中断，铁路桥梁遭受破坏。随后，总参谋部和河北省政府先后报告，邢台地区发生大地震，隆尧等县房屋倒塌很多，人员伤亡严重。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报告，震中在邢台地区隆尧县，震级 6.8 级。周总理得到上述报告后，立即通知总参，下令驻石家庄地区的部队和医务人员，立即出动，前往地震灾区，抢救受灾群众。当天中午，情况基本查明，下午周总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部署救灾工作。会议决定，卫生部立即组织医疗队前往灾区。商业、供销等部门立即调运救灾物资。组织中央慰问团，由内务部部长曾山任团长，前往灾区慰问受灾群众，了解灾情。周总理还决定，地震科研人员和建筑工程设计人员，立即前往灾区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会后各方面立即行动。驻邢台一带的部队，于当天中午最先到达灾区，抢救受灾群众。主力部队于下午和晚上先后到达灾区。军队和当地卫生部门派出的医疗队当日陆续赶到灾区。北京等地的医疗队于 9 日到达灾区。石家庄等地也及时将熟食运往灾区。中央慰问团 9 日到达灾区，地震科研和建筑工程设计人员也陆续到达。

周总理在百忙之中先后两次到灾区视察。3月9日下午乘专机到达石家庄市，首先听取当地驻军领导和河北省及邢台地区领导汇报，吃过晚饭后，在北京军区副司令郑维山和河北省委副书记阎达开等同志的陪同下，连夜冒着余震赶赴位于震中的隆尧县视察。周总理在听取救灾部队和地县领导汇报后，就伤员的救治，死亡人员的掩埋·搭建临时住宿棚子，吃饭问题，恢复生产和社会秩序，稳定群众情绪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和部署。周总理提出了在国家支援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抗震救灾工作方针，并且决定成立以部队为主的军队地方联合救灾指挥部（以某军政委蔡长元为主），统一指挥救灾工作。周总理在隆尧县开会一直到深夜。第二天周总理乘直升飞机再去受灾地区，先在空中视察房屋破坏情况，然后降落看了几个重灾村，并在隆尧县白家寨召开群众大会，号召群众团结起来，同自然灾害作斗争。

3月22日16时许，邢台地区发生第二次地震（7.2级）。当晚周总理决定中央慰问团再赴灾区。了解灾情，慰问受灾群众。23日，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召开会议，听取了灾情汇报以及科研人员对地震发展趋势的汇报，安排了救灾工作。当时，周总理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处理，委托李先念副总理和周荣鑫秘书长于3月25日前往灾区视察、慰问。李先念同志在刘子厚省长的陪同下，在灾区连续视察、慰问两天，并召开群众大会，慰问和鼓励受灾群众。4月1日，周总理再次到地震灾区，先后到宁晋县东汪镇、束鹿县王口乡、冀县马头李乡、宁晋县耿庄桥和巨鹿县何寨等五个重灾村庄进行视察和慰问，并在群众大会上讲了话。周总理鼓励灾区人民振奋精神，战胜困难，抓紧抗旱保墒，浇麦，春播，“家里丢了，从地里拿回来。”周总理在视察中了解到灾区不少群众由于房屋财产毁于一旦，余震不止，悲观恐惧，失去信心，便要求救灾部队组织毛泽东思想万人宣传队，用一个月的时间，对地震灾区群众普遍进行一次宣传教育，村村都去，不留死角，并在宣传中帮助群众春耕春播。根据周总理指示，救灾部队立即组织了66个连队，分赴邢台灾区所有村庄，向群众宣传，帮助群众春耕春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振奋了灾区人民自力更生的精神，当年夺取了农业丰收，获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邢台地震是建国以来第一次遇到的灾害损失非常严重的地震。当时我国对地震救灾还缺乏经验。然而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和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下，河北省和邢台地区各级党政领导，动员和组织群众，奋力救灾，取得良好效果。压在废墟下的群众，绝大部分被救出来，受伤的群众得到及时救治，灾区群众生活得到初步安排，生产迅速恢复，并在较短的时间里，把毁灭的家园重新建设起来。广大灾区群众衷心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子弟兵。

（二）周总理提出“以预防为主”的地震工作方针，要求地震科研人员，积极探索地震规律，早日突破预报难关。

严重的地震灾害，深深地刺痛了周总理的心。周总理在视察中，听到许多干部和群众反映，在大地震发生以前，出现一些异常现象。例如，鸡犬不宁，老鼠乱跑，井水突然涨落；临震前地下发现轰鸣声，地面出现地光等等。这些前兆现象，是探索地震预报的向导。周总理在思考：如果我们的地震科研人员掌握了地震规律，震前有预报，就可以大大减轻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周总理在视察中多次说：“这次地震，代价极大，必须找出规律，总结出经

验。”“虽然地震的规律是国际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应当发扬独创精神，来努力突破科学难题。”4月1日对科技大学地震专业的同学说：“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由于地震预报是一个科学难题，当时有的专家对能不能搞地震预报，是有不同看法的。我国著名的地质力学家、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同志认为，地震预报的难度虽然很大，但是地震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我们应当积极探索。周总理赞成并支持李四光同志的看法，并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地震有前兆，说明地震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周总理提出，地震工作要以预防为主，实行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的方针，争取用一代或两代人的时间，解决地震预报问题。周总理要“国家科委、聂总抓下去，一直抓，抓出大成果来。”

6月6日周总理签发了《国务院批转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加强地震科学研究工作的报告》，国家科委的报告中，把尽快突破地震预报，为建设基地的选址提供地震烈度依据，为建筑抗震设计提供地震参数，研究建筑物的抗震措施，作为地震科研的主要任务。“报告”中还提出，在我国西南、西北、华北、广东布设地震观测网，建立地壳物理等多学科的实验室。国家科委报告中提出的各项任务，已经逐步落实。多年来我国的地震工作者深入地震现场，全力地投入了减轻地震灾害的多方面的科研实践，至今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地球物理、地质、地球化学、大地形变测量、地震工程以及仪器制造、计算技术等多种学科的地震科技队伍，在全国已布设了地震及前兆观测台站500多个，区域遥测台网6个、地方性遥测台网14个，数字地震仪台站、强震观测台站以及大量的流动观测点。开展了大量的野外地震地质调查、深部结构地球物理勘探和室内实验研究。在地震地质、地震工程、地震预报、地震对策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索研究，获得了许多对地震孕育、发生过程的新认识，提高了地震科学的理论水平，扩大了地震科学为国民经济服务的领域。目前已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地震科技合作与交流。我国的地震科研已走上世界的先进行列。

自从周总理向地震科学工作者提出开展地震预测预报的科研任务后，我国的地震科研人员齐心协力，探索地震发生的规律，经过近30年的努力，已经取得相当成就。尽管地震预报尚是一个没有解决的科学难题，但是我们在实践中，对破坏性地震曾作出比较成功的短临预报。如1975年辽宁省海城7.3级地震的短临预报成功，大大减少了震区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对唐山大地震，虽然没有能够做出临震预报，但对京津、渤海北部地区也有过可能发生较强地震的中长期预报。国务院向有关省市转发

了这个报告，要求提高警惕，加强预防。多年来我国在地震预报的探索中所取得的经验与进展，已得到世界各国的瞩目。实践证明，周总理提出的开展地震预测预报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三）周总理提出，要抓住邢台地震这个机会，对各类建设物遭受破坏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周总理在地震灾区看到，震区房屋倒塌严重，很多地方成了一片废墟。地震中群众的伤亡主要是房屋倒塌造成的。由于房屋的结构和材料不同，受到的破坏不一样，也有一些房屋没有倒塌。周总理指定军委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同志组织建筑设计专家到灾区去进行调查研究。后来又请国家建委组织更多的专家前往灾区调查。专家们在调查中发现，邢台震区房屋倒塌高达五百多万间，其主要原因是房屋结构不好，大都是土坯房，屋顶重，墙体

又不承重，经不起强烈地震的袭击。根据以上情况，专家们提出了一些震区房屋建筑的设计方案，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这时，周总理又指示设计方案要征求当地公社、大队的意见，要做到切实可行。最后经过核定的设计方案，既考虑了抗震要求，又是当地农民财力能承受得起的。地震灾区按照这个方案新建的房屋，在1981年发生一次5.8级地震时，经受住了考验。

邢台地震不仅造成大量房屋倒塌，对工厂、公路和铁路桥梁、水利设施也有严重影响。周总理对此也十分关注。例如，位于平山县的黄壁庄水库大坝，在地震时发生裂缝，由于是枯水期，未造成严重后果。周总理特别指定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同志专门研究解决水库的加固问题。周总理明确提出：地震工作“要为保卫大城市、大水库、电力枢纽、铁路干线做出贡献。”周总理的这一指示，为我国的建筑抗震指明了方向和重点。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地震高潮期间，我们进一步总结了各次破坏性地震，特别是唐山大地震对各种建筑物的破坏经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保卫大城市的重点是保卫城市能源、通信、交通、供水等生命线设施。同时，人们也认识到，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关系国计民生的现代化工业、交通、能源、水利等大型建设工程日益增多，如长江三峡水利枢纽、核电站、海港、航空港和石油、天然气管道等等，事先做好这些建设工程的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选好地址，适当设防，是关系到国家和子孙后代安全的百年大计，不容疏忽。多年来，我国的地震科研人员和建筑抗震科研设计人员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邢台地震以前，我国处于地震区的各种建筑多数未考虑抗震设防，或者抗震系数过低；广大农村的房屋多属土、石结构，抗震性能更差。邢台地震后，国家建委和后来的建设部总结了经验教训，逐步制定了若干建筑抗震设防行政法规，编制了抗震防灾规划，加强了对建筑工程，特别是对城市能源、通信、运输、供水等生命线工程的防震抗震管理。1992年国家地震局和建设部共同发布了新的地震烈度区划图，作为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的依据。1994年年初，国务院办公厅行文提出了我国未来十年的防震减灾目标：“在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争取用十年左右的时间，使我国的大中城市和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地区具备抗御6级左右地震的能力。”随着这些措施的落实，必将大大地提高抗御地震的能力，把地震灾害减少到最低限度。

在我国的地震科研人员还不能准确地做出地震预报的情况下，对于在地震观测中发现的异常情况，如何正确处理，也是周总理关心的一个问题。周总理清醒地看到，地震预报，绝非短期所能解决。他多次讲过，对地震既要提高警惕，又要保持镇定。他对青年地震科研人员说：要大胆设想，积极实践，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但是，不要轻易下结论，地震的规律不是几天就可以认识和掌握的。1966年3月底，设在邢台震区的各种地震观测台出现异常现象，地震专家会商认为，可能出现强震。邢台抗震救灾指挥部的“简报”反映了这个情况。周总理阅后指示：要注意仪器记录和有感地震的变化，如果发生异常情况，就应当通知有关专区、县市、公社、大队提高警惕，但又要注意镇定和冷静地准备各项救护工作。周总理只把预报局限于地震灾区，而不扩大范围，表明总理对地震预报是持谨慎态度的。邢台地震后，我们在这方面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并且借鉴外国的作法，1995年2月11日国务院发布了《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全面规定了各项应急措施。这就可以使我们在破坏性地震发生后，能够迅速有序地进行救灾，减少损失。

邢台地震至今已经 30 年了。回忆当时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急灾区群众所急，想灾区人民所想，日以继夜，抓抗震救灾的情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谆谆教导我国地震科学工作者，树雄心立壮志，努力探索地震规律，早日突破地震预报难关的殷切心情，历历在目。尽管邢台地震后不久就搞起了“文革”，周总理提出的地震科研、建筑抗震等一系列任务的落实受到严重干扰，但是由于各有关方面的同志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总理的指示，仍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使我国地震科研和建筑抗震步入了新的阶段。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周总理为我国抗震救灾、地震科研和抗震防灾做出的伟大贡献。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许多次骇人听闻的大地震，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失。1976 年的唐山大地震造成的惨重灾难，人们记忆犹新。因此，加强地震科研工作，探索和掌握地震发生的规律，早日突破地震预报难关；加强建筑抗震科研和抗震防灾措施，以减轻地震所带来的灾害，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希望，是从事地震科研工作的同志们的光荣任务。

我们相信，我国地震科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沿着周总理所指示的方向，经过顽强奋斗，一定可以揭开地球的奥秘，掌握地震发生的规律，突破地震预报难关。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我国建筑抗震设防将更加有效和普遍。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世界地震科学事业做出贡献。

